

独立阅读

2009 年 2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戴新伟（广州）、朱 白（广州）、罗四鸽（上海）

经济：苏小和（北京）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成 庆（美国·波士顿）

特约撰稿人：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慕尼黑）、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曾园（昆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程明（济南）、马庆（上海）、张无极（北京）、连晗生（广州）、王炜（北京）

翻译：陈丹丹（南京）、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画家萨宾娜接受的是现实主义画风的训练，技巧精熟，画出来的社会主义工厂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由于偶然的疏忽，一滴油彩滴到了已经完成的画面上。萨宾娜惊奇地发现，污染画面的油彩在严整的现实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一幅不和谐的景象。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生活在如此盛世，没有一些出自偶然的油彩，难免有人间天堂的错觉。为了补充偶然之不足，有必要在此提倡为澄清常识而进行的写作。

常识者，本来是寻常见识，也可以解作常人之所知所识。然而，如果不幸生在常识被有意掩盖和歪曲的神奇国度，常识不常，人们难免常有生无常的感觉。写作者值得为回到常识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谈不上启蒙，仅只是为了自我教育，免得不时被世事所震慑，影响健康。至于思考所得是见诸著作还是见诸报端，见诸博客还是课堂，或者更只是发表于二三友好之间的闲谈，倒是无关紧要，均无不可。

写作和阅读往往是为了克服孤独。常识是孤独的。让我们努力。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白 朱航满 罗四鸽

文史：王晓渔

音乐：成庆

艺术：言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飞：梁启超：文化启蒙的舆论骄子

孙骁骥：谁误读了布兰森

书评

戴新伟：小丑的提醒

马慧元：不快乐的作家

王晓渔：“史无前例”不是史无前例

逝者

夏佑至：约翰·厄普代克

诗歌

王炜：怎样概括外观

凌越：词语将我们完整地隐藏

译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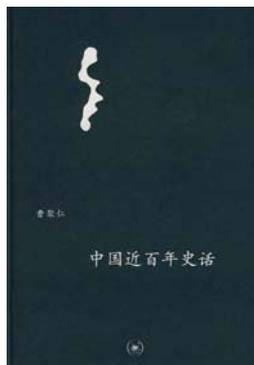
Adam Hochschild：古拉格的美国人

罗杰·斯布鲁顿：西方强大的秘密：宽恕与讽刺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首先我要提到的书,是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1月)。这本书曾由香港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过繁体字版,此次是大陆第一次刊行其简体字版。这当然是一本小册子,五六万字的篇幅,但包容量却很大,百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均在其中闪烁,历史的细节纷至沓来,让后来人不胜唏嘘。我读到了当年《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梁启超笔锋当然卓然,但《民报》阵营中的章太炎、汪精卫、孙中山,也当仁不让。《民报》的发刊词还是孙文所作,首先把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主义连贯起来说出,提倡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过梁启超先生不赞成社会革命,他驳斥了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意见,对《民报》的土地国有论,作为三个方面的驳斥,认为在财政上、经济上、社会问题上,都不应该采取国有政策。

一百年过去了,当所有的中国人都混迹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时,忽然发现梁启超先生早就为我们说出了常识,可是人们却对先生的话忽略了百年。国家迷茫、凋敝,个人生活一代比一代凄惶。身处如此不确定的时代,一个读书人如何坚守住常识,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最近,我再一次听到有人提到了奥地利学派,而且是由争议一直不断的张维迎在公开场合说出。在亚布力满地的冰碴中,我看见张维迎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提醒人们:政府可能是愚蠢的,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在现场听张维迎演讲的人们不下500人,网路上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在看。我知道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把所有糟糕的、恶毒的言辞从自己的胃里吐出来,发泄完了,也疲倦了,转身走到床上,在一片呼噜中开始筹备第二天的生活。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窘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看上去甚至有一些急躁,有一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他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题,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由此,他直接扒下了政府短视和自私的面皮。

面对高西庆先生面对面的商榷,张维迎甚至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事实上,高西庆先生高居中投公司总裁官位,掌管着令全球眼热的万亿外汇储备的运作,这种政府利益诉求是非常明显的。而这,刚好是奥地利学



派反复阐述的课题，官僚体制与反市场心态，所以，张维迎不仅没有被高西庆先生的商榷说服，反而进一步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勇气和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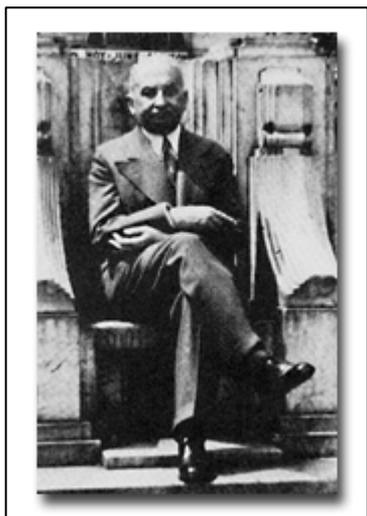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极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没有党和政府，能有他张维迎的今天么？

显然，我没有在这里为张维迎声援的企图，只是建议读张维迎。

书使人沉下心来，回到奥地利学派的书籍之中去。去年这个时候，我读过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官僚体制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和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认真读过这些书的人，会对今天中国经济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态势有更加宽泛的认识。

我想说的是，眼下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 40 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收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务员。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权力中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从米塞斯扯到了张维迎，看上去有些别扭，但张维迎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派的观点，目前美国、中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刚好，罗斯巴德曾经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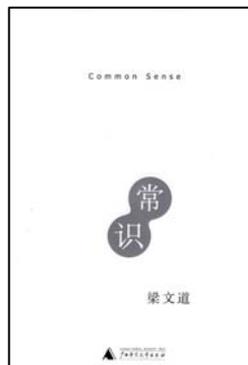
“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张维迎可能是这种纯粹教育性质的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未来将怎样演绎，我相信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因此我也相信，未来可能就在张维迎的教育之中。

等着看吧，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ESSAY&STORY 散文与小说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一直觉得好的杂文,就应该是普及常识,而不是那些卖弄、缠绵、显摆、扯淡、油嘴滑舌、语不惊人死不休、匪夷所思的个人情趣等等,比如鲁迅和王小波,其杂文高度至今也没见哪个人超越,而他们杂文最大的贡献就是普及常识,常识之外几乎没有废话。如今以杂文或称专栏养家糊口的作家不少,但真正严谨并少说废话的不多,即便好的专栏作家也只是停留在王小波多年前就做过的那些事。对常识的普及,好像多少次重复也不算多,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家,不尊重常识已经成为“常识”,所以梁文道之类的作家还要继续在报刊上亮出那些早已应该知道的常识。《常识》(梁文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作为书名,既是梁文道的谦虚,也是一种务实精神和尊重常识。常识在现存的环境里其重要性不必多说,梁文道说:“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正因为世事不以善意的时评家为转移,它们不但反复出现而且变本加厉,这样的时评才显得更加重要。《常识》用朴实的语言和简单的造句,对近年来社会时事以及世界格局按照“常识”的方式娓娓道来,看梁文道的许多文章跟看他在《开卷8分钟》、《锵锵三人行》做主持和嘉宾是一样的,都是怀揣着善意带上一点点愤怒用最直白的道理普及那些简单的常识。



作为人们内心深处共同的价值观,“常识”是一个可以不断溯源的话题,早在200多年前,美国人托马斯·潘恩就用一本小册子讲了一个至今仍需要人们学习和尊重的《常识》。1976年出版这本小册子批评英国国王残暴无能,认为独立后的美国应该建立共和国,后来的《独立宣言》精髓部分大多来自于托马斯·潘恩的这部《常识》。



面对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很多人失业或者处于失业前的恐慌中,为了最简单的活命我们却要付出如此之多的代价,这种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甚至仅仅是出于勇气幻想一下“上来透口气”。乔治·奥威尔这部《上来透口气》(孙仲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里的小人物的苦闷和被命运的折磨,正是任何坏不健康时代的缩影,他感到苦闷的同时发出了强烈的愿望——上来透口气,所以他离开家人来到童年小镇……当然,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作为读者可以这样来看,在恰当的时节看这样一部质疑整个现代社会的小说,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

有的作家态度鲜明喜欢质疑和发表意见,有的作家则轻易不肯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乔治·奥威尔显然属于前者,那么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在通常状况下则应该属于后者。库切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尽管他也常有一鸣惊人的观点(如他那些应邀而写的书评),但他在文学的意境里更容易找到自我,关于这一点你只要看他的《耻》和《青春》就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纯文学”的作品并不是针对某一个时代来说的,它的合适居所应该所有人的内心深处。库切的新作《凶年纪事》(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仿佛一下子放入了库切一生的空缺——政治、国家、世界格局等等,并以严谨的论文形式见人。当然,如果仅仅有枯燥的论述就不能称之为小说大师了,库切的天才之处是能在看似宏大的叙事中加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直指人心的细节,故事中的老年作家面对年轻打字员,每一处细节无不揉入了人性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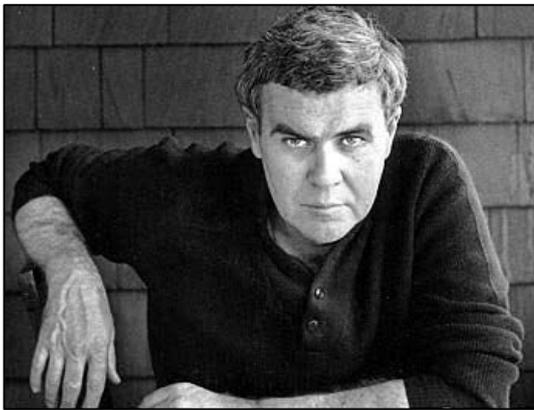
作家在有生之年对自己的审视,可以看做他的成熟之为。我是说,如果他的这部自传足够好的话,那么他起码在写字这件事上已经成熟了。保罗·奥斯特的处女作《孤独及其所创造的》(BTR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介于传记和想像之间,虽从传记的角度讲难看出真诚(所谓神秘就是不够真诚的一种体现,还有缺乏细节和含糊其辞的语言),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已经足够天才了。这两年接二连三被翻译出版的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可以是汉译小说的一个奇观,甚至此人已经被追捧为新一代大师。保罗·奥斯特到底怎么样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呢?以我个人的偏见来看,保罗·奥斯特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小说家,他懂得向某种方向迎合和进攻(《布鲁克林的荒唐事》直截了当地为普

通人唱了一曲超级诚恳和中庸的赞歌),也恰当地指出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某些弱点(《密室中的旅行》正是告正人们一个人的生命时间是多么荒谬,你看到的平庸和怪诞难说正是你自己的故事),他用一种轻柔的方式打通了现代人普遍缺失的那扇命门,他也可以为每个读者感受到他那最诚恳的礼遇,这些大概就是他的成功和得到赞美的一点原因。但,说实话,在读过几本奥斯特的书后,我真诚地感觉到,这位作家的“轻浮”和聪明似乎不是我需要的。

一个读者需要什么,无论如何都不重要,只能代表个人口味,只要口味不至于太臭,都问题不大。作家无需针对某个读者的口味负责,他要做有时候简单得就像小孩玩耍的游戏——只要自己喜欢并真的喜欢就好。

一本好书就像一件好事一样,通常都是经得起折腾的,或者说作为一部好书它也必须承担起被折腾的命运。《瓦解》在问世半个多世纪和被翻译 50 多种文字后,中文版同大家见面了。

《瓦解》([尼日利亚]阿契贝著,高宗禹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1月)所描述的尼日利亚悲剧领袖,处于一个跟近代中国类似的时代,文化瓦解,道德溃散,而真正痛的则是对此的重建过程。在先前出版的《人民公仆》中,就已经让人看出阿契贝的眼光不仅仅停留于非洲大地,作家要做的正是如此,从身处生活的细节中发现一张人类的通行证,尼日利亚的寓言故事也许此时正在彼岸的某块大陆上发生。



雷蒙德·卡佛

说到人类的通行证,我相信在雷蒙德·卡佛那里也有一张。多少年来,他的那些忠实读者只有一本可怜的《你在圣·弗兰朗西斯科做什么?》,但却痴迷不改。到了近些年,上网与同好交流已经成为卡佛迷的一个秘密,那些出于喜欢卡佛的人翻译的小说流传于网站论坛,没有太多的激情,只有彼此心中对卡佛这个如同镜子般映射出了少数人心里秘密的人的点点相通。所以春节前出版的《大教堂》(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应该算是一件礼物,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卡迷心中,小人物面对平庸生活所不得不要面对的那些破事儿,难道不也是你的生活吗?无论得意洋洋还是错失良机变得穷途末路,生活是逃不开卑微二字,难道你的头会永远高昂着吗?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 zhm7976@126.com)

生活在一个缺乏文化积淀的城市,对于一个性喜热闹的文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研究生毕业那一年,我向导师抱怨所在城市文化的粗鄙,言下之意是想请师尊帮助调换一下工作,但师傅的回答可谓巧妙,“你所在城市文化积淀固然薄弱,但还是贡献了一个作协的主席!”我闻之,差点晕倒。倒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久了,才发现本城文人虽然不够显眼和扎堆,但高手却还是有些,不过,他们似乎都统一表现得谦和和低调,在我看来,很有些当下隐士的境况。前段时间读过一册杂文集《中国好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此著副题为“刀尔登读史”,大多为读史阅人的小品文字,所论历史人物约六十余位。时下读史著作甚盛,各类报刊充斥文字也极多,但读此著,感觉对史料有通融之感。关于此君,之前偶然在报刊上读过几篇文章,也未太过留意,倒是去年湖北一位热衷于杂文写作的朋友来本城开会,问及此君,似颇佩服,可惜当时我并未耳闻。后来在网上看过此君的一些资料,还颇有传奇色彩,刀君原名为邱小刚,当年曾为本省高考状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时因拒绝向某官僚低头献媚而未能留京,之后的经历在为此书作序的缪哲先生的文章中有所谈及,抄来如此:“我和刀兄是相知二十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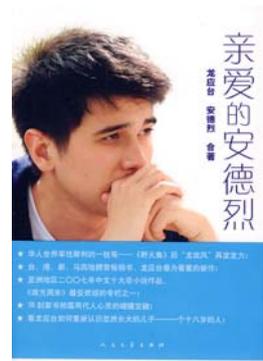


的老朋友。我们一起读大学，一起行走于某省的‘南书房’。一起编报纸；在被人威胁夺下‘五斗米’时，又‘挂冠’而去，一道‘回家再读书’了。”刀尔登另有一笔名三七，曾以此名在一套“曾经北大书系”出版过一册随笔集《玻璃屋顶》，现已很难见到。在我所生存的这个文化荒陋的城市，有缪哲和刀尔登这般的妙人，真可算作一个奇迹。



身居小城，好处是可以隐身其间，安心读书，静心写字，或许可以怡然自得；而身居闹市，眼观六路，信息发达，容易出人头地，但难免会身心俱疲，穷于应付，或许未必是好事情。陈丹青自《退步集》及其续编大热之后，又于年初推出了的这册《荒废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读来依然快意。陈丹青的文字好，而其著装帧之佳也堪称赏心悦目。此书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文章《毕竟年轻》最可一读，之前陈氏曾与查建英对谈八十年代，可以互相参阅，两方对读后，才发现原来陈丹青很有一颗顽皮的童心，敏锐而率真。而读陈丹青此著中的文章，颇可感到当下知识名流的尴尬困境，担心寂寞没有知音和粉丝，又苦恼于被各种无聊的社交活动所包围，很难有安静地心情去工作和思考。此著收录有京城一媒体对陈丹青的挑逗文字，当然也有当下名士的陈丹青的激烈回应，读完之后，颇感些荒唐，媒体招来了看客，名士增加了分量，其实不过是一场严肃的文化游戏罢了。

每到年底，各类年选形形色色，但值得一读的似乎并不太多，而另外一个与之相仿的文化热点则是各类媒体所进行的年度盘点，简直也有些令人眼花缭乱，许多盘点人云亦云，并无主见，倒是《亚洲周刊》的十大好书评选是不多以世界范围内的华文创作进行整体评价和盘点的，有特点也有态度。2007年和2008年连续进入非虚构十大图书的，是曾刮起“龙卷风”的龙应台女士的著作，其中2007年为《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2008年则为《目送》。前者是她写给自己的孩子的书信，后者是她书写有关亲情的散文，读来皆是满纸的儿女情长，内在之中包藏着的却还是一个知识分子阔大的经纬。我手边的这册书是在书店的家庭教育书架上找到，因此颇费了些周折。读完全书，感觉放在家庭教育书架上实际并非合适，尽管龙应台先生很敏感的发现了她与自己的孩子——一个十八岁且具有国际背景的青春少年——之间的情感隔阂，但她没有进行太多的家庭教育，而是各自表达自己对于世界与人生的态度，她的孩子安德烈，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早慧且懂得独立思考的孩子。龙应台女士在序言中透露了秘密，此书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面向大众的专栏，因此不必期待太多更私秘化的教育与交流会在这里出现。我很喜欢龙女士的文笔，侠骨柔情，能将坚硬的话题很好的转化成为适合大众的口味，我们太缺乏这样有魅力和感召力的笔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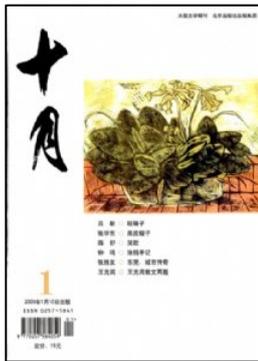
LITERATURE&MAGAZINE 文学·杂志

观察员 罗四鸽（上海，zhm7976@126.com）

如果把文学与音乐、绘画、戏曲、插花等艺术，与剪纸、打铁、捏泥人、画年画等民间手艺，甚至是与炒菜、做饭、种地、养鸡养鸭等生活技巧等而视之，而不把它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么，当代中国文学的名声可能就没有那么臭，甚至会发现，1990年代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才开始正常起来，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或是说文字手艺活，不是退步了，而是进步了。（我私下认为，如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正是那些被著名作家和80后作家埋没的生于70年代的作家。）我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很难看到《暗器》这样精湛的短篇小说的。一段父亲“我”的回忆、一段儿子“我”的叙述，缪克构的《暗器》（《上海文学》2009第1期）亦如一枚变幻莫测的暗器，在2500字不到的篇幅里，闪现几个片段，便将一个瞎子三十年复仇的传奇故事讲得波澜起伏，令人叫绝。面对着有点面熟的盲人词鼓手，父亲“我”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一次出海捕黄鱼时，满载而归的返航途中却因迷路而流落炎亭，在炎亭，酒后乱性的“我”侮辱了驼背锡即将过门的弟媳。饭桌上，几句闲聊，父亲想起眼前这位盲人正是驼背锡的弟弟，盲人词鼓手也认出父亲便是自己寻找多年的仇人。能听见黄鱼叫声的他听到了父亲急促的心跳，从鼓中射出暗器，杀死了父亲，为含羞而死的未婚妻报了仇。母亲一再告诉

我，父亲 1983 年捕来的黄鱼晒满村庄，由此引来仇人，被仇人所杀。而我仔细计算，父亲捕黄鱼与父亲被仇人所杀两件事分别发生在 50 年代和 1983 年。小说尤为精彩的是最后一句结尾：“显然，母亲疯掉已经好些年了。”不仅交代出故事的时间，解释了母亲叙述的错误，还让故事在时间上得到延长，其中内藏的悲怆与沧桑让这个复仇故事的情感与意味立即变得复杂深远，难以名状，而只有到此时，才完完全全看到缪克构的“暗器”落到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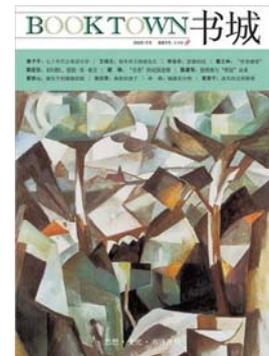
如果用绘画来比较，《暗器》便犹如硬朗拙朴的钢笔画，宁夏作家张学东的《羔皮帽子》便如意境深远的中国画了。打铁、圆木、剪纸、面塑、泥人、蔑竹、皮匠、草编、纺纱、织布……，不知何时，这些曾浸润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民间手工艺，以及其中内含的民间传统与理想，已在如今嘈杂的社会中默默消失，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美好记忆。



张学东的《羔皮帽子》(《十月》第 1 期)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好记忆。“我们的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皮匠，这不仅因为爷爷手艺精湛，还因为爷爷的认真与诚实。带着一丝温馨，小说慢慢悠悠地回忆了爷爷是如何一步一步将那些硬梆梆、带着斑斑乌血的生皮子，经过浸、漂、揉、刮、磨等一道道工序，制成雪白柔软、富有弹性的熟皮子的，以及在干活间隙，爷爷给我们讲的手艺活中的为人之道以及爷爷珍藏的一项羔皮帽子的故事。小说中，爷爷对自己手艺后继无人的感慨与“我们”对爷爷故事的不以为然，让爷爷这位年迈的民间艺人的背影越发显得孤独寂寥，又给这个细腻温馨的故事铺上一层淡淡的惆怅与感伤。

张学东曾说，他所追求的好小说，笔法从容，气息静谧，有流水行云之势，又不温不火，不贪恋繁华与喧闹，犹如泼墨山水先着力渲染铺陈，又恰到好处戛然而止地留出大片空白来，全凭一种深远的意境与不俗的气韵为依托。《羔皮帽子》就是这样的好小说。

《书城》(2009 年第 1 期)刊有学者黄子平的文章《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文中，他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海南岛的知青生活，以“起床啦！起床起床！”、“五一工程纪要”、一封公开的情书、陈村全篇引用歌词的短篇《我的前半生》等为例阐释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文末，黄子平感叹，“如今，当我竭力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悲哀地直面它的贫乏和苍白，琐碎与枯燥。难道这就是我消逝在热带雨林的青春岁月？我想起鲁迅关于记忆的一个比喻：血水中闪烁的鳞片……”在文中，黄子平还借用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的文字，说明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体国人预先抛入了在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在黄子平的记忆中，“唯有这大统铺清晨的‘起床啦！起床起床！’，具体地从四川汉子口中发出，伴以尖锐的哨声与手电筒光柱，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最能凸显我和我的农友们所处的主体位置。”



若想要更加感性地体会到黄子平的悲哀，看到日常语言是如何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的，我想荆歌的中篇小说《赵家当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级别相当于县长的赵团长来当校长了，这让崇拜军人的小镇中学的所有师生感到无上光荣。然而荆歌在《赵家当年》(《花城》2008 年第 6 期)中讲述当年赵家往事时，却把重点放在了有着高度革命性和阶级斗争思想觉悟的赵家如何与家中的鸡和老鼠做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于是，在赵家五口崇高庄严、慷慨激昂的行动与对话中，呈现出的却是一个让人哑然失笑的滑稽闹剧：一身戎装、威风凛凛的赵校长在屠鸡事件中败给了赵妈妈的哭声，在领导全家人甚至全校师生与阶级敌人老鼠进行革命斗争时，更是一而再，再而三遭受惨败，并导致儿子赵威离家出走。出走的赵威，却又因将伟大领袖的宝像张贴在自己的藏身之地——公厕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工纠队抓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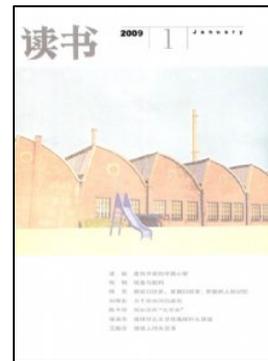
最后又因闹水鬼被放了出来。或许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然而荆歌独特的视角和叙述，将这个有些老套的沉重故事变成了一个漫画式的轻松速写。在他那充满善意嘲讽和略为夸张的生动叙述中，赵家当年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与争吵，以及他们的那些“革命”行为都变成了今天让人捧腹大笑的“糗事”。只是，故事中隐隐出现的严酷的社会环境、字里行间透

出的无奈与悲凉以及赵家一家人血浓于水的亲情，又在提醒读者：别笑，这是真实的。小说中，大量引用的那个年代的指令、口号、歌词、标语等，更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活泼泼的“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

为什么如今文学会如此被冷落，甚至嗤之以鼻呢？我想，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其历史身份过于复杂。是人学？是工具？是娱乐？是艺术？究竟什么是文学，估计这个问题会让所有的人为难。如同早期一些身份过于复杂的作家，也让人万万为难，如刘心武《兰畦之路》（《上海文学》2009年第1期）中讲述的胡兰畦和杨晶《杨刚之死》（《读书》2009年第1期）中讲述的杨刚。我无法概述这两位女作家的复杂经历和身份，只能引用原文中的片段。

刘心武《兰畦之路》：“1950年以后她（指胡兰畦）在北京工业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不是担任教职，只是一个总务处的职员。那时候北京工业大学在皇城根原中法大学的旧址，离我家所住的钱粮胡同很近。当她灰头土脸地走过隆福寺前往我家时，街上有谁会注意到她呢？谁能想像得到这曾经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大潮乃至国际大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呢？谁知道她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事迹，被茅盾取为素材，以她为模特儿塑造了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呢？更有谁知道她曾经和蓝萍，也就是江青，以及其他当年美女一样，登上过《良友》画报的封面呢？”

杨晶《杨刚之死》：“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杨刚的身份最为复杂。她的身上曾有过各种头衔：建国前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建国后先后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时，她还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左翼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国际问题专家……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作家中，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先后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说，杨刚是影响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杨刚却以自杀的方式骤然辞世。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人们对她的死讳莫如深，但没有追悼会的遗体告别，足已使人懂得，缄默是最好的悼念方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刚的名字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八十年代，由于《杨刚文集》的出版和萧乾等发表的有关回忆性文章，她才又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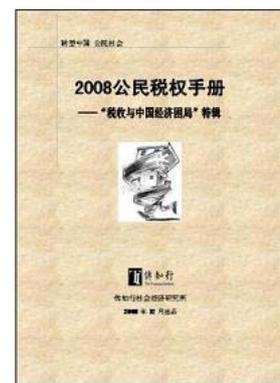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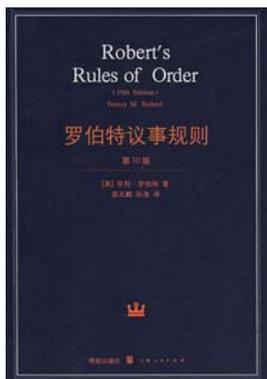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读到一种电子读物《2008 公民税权手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品，诸位看官可以在该研究所的主页（<http://www.transition.org.cn/>）下载。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理念是：“在自由立场上，倡导保护产权、深化市场、拓展个人、企业与 NGO 的活动空间；在公正立场上，倡导透明开放的宪政秩序，避免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伤害；推动中国朝尊重人权、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方向转型。”我对这种理念几乎完全赞同，只是在“避免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伤害”上稍有异议，宪政秩序不仅保护弱势群体，也保护其他公民。在我看来，弱势群体不是专指老少边穷、孤寡鳏独，所有受到制度性伤害的公民都是弱势群体。

《2008 年公民税权手册》从公民的另一重身份纳税人的角度出发，梳理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陈述政府的责任和纳税人的权利，这些都是当下最为稀缺的“常识”。尤其是一些公仆们，忘记他们的收入“取之于民”，自然也不会考虑如何将税收“用之于民”。位于江苏欠发达地区的灌南县，投资上亿元修建的市民文化中心，建成之后成了政府办公楼，对此灌南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刘琴代表灌南县官方向媒体表示：“我们的办公楼哪里‘豪华’了？再说，手续都是合法的，又没有使用老百姓的钱。还有，我们的这个工程也没说是‘惠民工程’。”（《东方早报》2009年2月20日）如此雄赳赳、气昂昂，这个公仆充分展现了父母官的风采，大概在她看来，政府的钱来自造币厂，与纳税人无关。公仆不愿关注常识，可以理解，但是很多并非公仆的公民对此不闻不问，等于放弃自己的权利。





与很多纸质读物强调版权不同,《2008 公民税权手册》“欢迎下载传播”。公民意识的培养不必从抛头颅、洒热血的大事做起,编写常识手册就是公民意识的最好展现,即使没有能力参与编写也没有关系,阅读并且与朋友分享,这只是举手之劳。最近读到一种杂志《我爱摇滚乐》,那种寓教于“乐”(兼有娱乐的“乐”和音乐的“乐”)的方式,让我在地铁里看得笑出声来。在这本杂志上,我还看到了《2008 公民税权手册》的片段,分外亲切。在新闻事故高发地区安徽阜阳,《罗伯特议事规则》(格致出版社,2008年4月)的译者之一袁天鹏先生成功地将这一规则引入乡村会议,催生了“萝卜白菜规则”,村民按照程序讨论公共问题。看到《2008 公民税权手册》和“萝卜白菜规则”,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让我想起一句广告词:“我们一直在努力。”

努力未必会有回报,有时还会付出代价,2005 年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女士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被取消授课资格。最近有幸获赠她与先生赵雨合著的《元典之命运:以1956年思想学术境遇为中心》(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8年1月),这本书着眼于“1956年的诗经学研究”,却没有限于盖棺定论的学术史模式,而是试图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寻找“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种基本共识曾经存在,可是在今天似乎烟消云散,尤其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定“安内必先攘外”,几乎成了“文化闭关主义”。“新儒家”徐复观和“自由主义之父”胡适,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是徐复观听到胡适逝世的消息,立即打电话给杂志,请求停止刊登此前写就的涉及胡适的批评文章,并且撰文《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载《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表示:“强调自由民主,是超学术上的是非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理念,保守主义往往是文化理念,二者完全可以共存。

谢岳先生在《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里指出,在文化与民主的匹配问题上,民主理论家经历了一个从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到伊斯兰教的理解过程,在民主实践中儒教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儒教是否适合民主一概而论,而是要分梳儒教的不同脉络,同时分析文化传统里的其他思想资源。在我看来,把文化传统界定为儒教,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毛泽东教育郭沫若“百代都行秦政制”,他很清楚“儒表法里”的法家是主旋律。有的学者为了在文化传统里寻找民主资源,把法家等同于法治,这是南辕北辙。文化只是《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里很小的一部分,这本书主要分析了民主转型的理论、条件和模式,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抗争的过程与机制。谢岳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的译者,蒂利的《社会运动,1768-2004年》(胡位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指出社会运动不是泛指所有的公共行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首先需要区别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一提到民主就想起了“文革”,就像把法家等同于法治,也是南辕北辙。



在声势浩大的反低俗运动中,网友们已经体贴地为世界名画中的裸体们穿上了衣服,不知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09年1月)是否属于低俗文化?这位“恶之花”诗人的天堂,由酒、大麻和鸦片制造。波德莱尔这样描述天堂和地狱的关系:“那些追寻天堂的人得到的是地狱,他们正在成功地准备着这个地狱、挖掘着这个地狱;这种成功,如果他们预见到的话,可能会吓坏他们的。”同样的意思,海涅也曾说过,马克思曾经引用过这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ART 艺术

观察员 言一（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半年过去了，我却依然记得我曾在波德维尔的《世界电影史》导论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但一般来说总不会是一个 1977 年的电影制作者为了迷惑电影档案人员而伪作的 1915 年的意大利电影(电影史家很少需要像美术史家那样要提防伪作)。我亦记得我在读到这里时，脑海里瞬间蹦出的却是一个强烈的疑问句：**Why not?** 为什么不伪造一部年代久远的电影拷贝呢？是因为这样的拷贝不够珍贵么？显然不是，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尤利西斯的凝视》里，那些历经战火刻满记忆的拷贝是多么的宝贵。从而，一个更加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古老的电影拷贝似乎只具有电影史的意义，在经济上无利可图。电影史学家们可能会为了《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末尾的剪辑吵得天翻地覆；但这样的争吵对于普通人而言，恐怕意义甚小。

半年之后，当我在凌晨合上奥斯特的《幻影书》之时，我发现他几乎是从我思绪曾经触及的各个层面对我进行了回应。当然，也许回应一词用在这里是有些不恰当的。因为奥斯特的《幻影书》写于 2002 年，而我的思绪却是飘飞在 08 年的秋天。一切，都再次证明着我的后知后觉。

仅仅是在读到《幻影书》第二章的一半时候，我便已经在 90% 的程度上相信：如果不是奥斯特的话，我恐怕就要与这位名为海克特的隐匿的默片大师失之交臂了。我迫不及待地去到网上搜索关于海克特的信息与作品，我甚至强迫自己停下阅读以避免剧透。种种行为都表明：奥斯特的魔法起作用了(btr 语)——我被他所虚构出来的这位名为海克特的默片大师搞得神魂颠倒。



保罗·奥斯特

即便是在知道了海克特乃是奥斯特所虚构的人物之后，我却依然愿意相信他的存在。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有如同奥斯特笔下那般的默片出现，无论主角是否叫做海克特，无论是拍摄于过往还是当代，都必然是默片中的杰作。而在对于默片的认知上，我想：我，奥斯特，巴拉兹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我们都倾向于认为：默片是一门已经死亡的艺术，一门已经彻底灭绝并且永不再现的艺术。那是一套纯然且独特的语言，人们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它们就像诗，就像对梦的翻译，就像令人眼花缭乱的灵魂的芭蕾。（选摘自奥斯特原文）

对我而言，奥斯特在第二章里对于海克特作品《隐形人》细致入微的刻画，已然成功地把一部优秀的默片呈现在我脑海。整个第二章也因此成为了神似于阿莫多瓦在《对她说》里的惊艳之笔，以默片作为载体完成了情节的完美过渡。与此同时，《幻影书》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则成为了我所读到过的为精彩的虚拟影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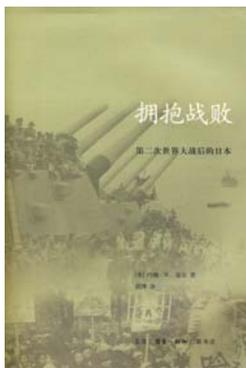
Why not?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照着奥斯特给出的剧本来拍，或者伪造一部上个二十年代的电影呢？这依然是我在阅读的间隙不断去思考的

问题。而令人惊讶的事情在于，当我读到小说结尾部分时，我恍然发现原来奥斯特已经以自己的行动部分地回应了我关于伪造电影的疑问——当马丁·弗罗斯特这个被海克特用来命名自己某个晚期作品的名字映入我眼帘之时，我突然被针刺一般地想起：这个名字似乎也曾在电影的形式走进过我的生活。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奥斯特在小说发表五年之后，在 07 年将这部虚构的电影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名字——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搬上了荧幕，而其中的主演除了在《两生花》

里气质无伦的 Irene Jacob，也还有奥斯特自己的女儿 Sophie Auster。

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烟》到《世界的中心》，再到《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奥斯特其实不时地以电影人的身份在我生活中闪现。只是当初懵懂的我，所记住的仅仅是王颖(最近他有部新片上市，叫《千年敬祈》)；而现在我则开始对奥斯特有所期待，期待他会在某天以电影人的身份，带我重回属于默片的辉煌年代。

影与书，就这样在奥斯特那里以一种水乳交融的方式相互缠绕，任何试图去将他们剥离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你很难说存在与想象中的火与真正的火有多大差别。但在其他很多时候，影与书之间的联系却远不是这般紧密与明显，有时候你甚至需要一点联想，一点猜测才能将二者放入思维的同一平面。



我是背对着电视，就着电烤炉捧读这本《拥抱战败》的。电视里的种种联欢尽管吵闹，但是对于曾经深受金属音乐熏陶的我而言也就只是普通的环境背景。这，大约算得上爱听摇滚的好处。但归根结底，还是这本《拥抱战败》写得太过精彩，读得我不忍释卷。

依然是在去年。在我熬夜看完了动漫版的《七武士》和黑泽明版的《七人之侍》之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日本人在动漫的改编上有着如此深重的末世情节？在黑泽明的版本里，影像所展现的只是一个民间故事，而在动漫版里却演变为古老的武士与机械武士之间的碰撞，游弋其间的更有着浓烈的政治诉求。在日本的传统里，并非缺乏奇侠类的传奇，如果单是从商业角度考虑，做一种奇侠类的改编未必就不如这种科幻类的改编。然而，在其他动漫和日剧中同样有着大量带有这种科幻末世主义的情节出现。日本人对于商业社会，科技社会如此大力度的反思动力究竟从

何而来？

现在看来，对于不少的日本人而言，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玉音放送，其实不啻为一纸末世宣判。战争已然结束，大多数日本人等来的并非是之前被告知的荣光，取而代之的是失败，疲惫，饥饿以及绝望。或者，用鹤见和子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全社会性的死亡。从前那个想象中的世界已经化为废墟，而他们则需要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美军的进驻与麦克阿瑟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度，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非众口一词的 yes。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所必然历经的混乱更是成为了当时日本国民所不得不经历的苦难的历程。这历程中的种种残酷，曾经被宫崎骏在《萤火虫之墓》里以充满童真的方式展露无疑。

正是在美国占领军进驻的同时，那些驻扎在日本本土的军人纷纷展开了对军用物资的疯狂掠夺，这其中亦包括那些幸存的神风特攻队队员。短短几个月内，就有价值 1000 亿日元的军用物资不知去向。当然，这里的不知去向，仅仅是指无法确切地得知物资所流向的个人；紧随其后的黑市的兴旺与大肆发展，已足以表明一切。相比之下，那些离开日本进行海外作战的日本士兵则正遭受着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折磨。他们一方面被国人，乡人指为战犯；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受着战争带给他们的肉体上的伤痛，残疾以及归国后的贫穷。面对着这两个如此典型，却又有着巨大反差的形象，不由得我不把他们与动漫《七武士》中的将自己改装为机器人掠夺农民，服从商业城市的“野武士”和那些深感自己已无用武之地的流浪武士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应当是一种隐喻。只是，这种隐喻究竟是刻意为之，还是荣格集体无意识下的行为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东亚文化中的一员，日本在拥抱战败中所展现的种种细节对于理解其后来的崛起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其中的不少对于处于转型中的我们亦不无可借鉴之处。只是，对于上



陈绮贞

述诸多细节的了解,我们却需要借助出自大洋彼岸约翰·道尔先生手笔的这部翔实巨著,这对于作为邻国的我们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

日本国民在面对战败时,其拥抱的姿态是多种多样的;而国内的乐迷在拥抱独立女皇陈琦贞的时候,也绝不仅仅是一种“花的姿态”。事实上,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有许多乐迷在用一种批判的姿态来拥抱陈琦贞,拥抱苏打绿,拥抱所谓的小清新们;而最近陈琦贞新专辑《太阳》的发行,则把某些地方几近变成了唾沫横飞的战场。

单就音乐而言,陈琦贞的这张《太阳》真的就如同专辑名一般,过于饱满,四射光芒。精致丰富的编曲所带来的,却是以往空灵,轻盈的缺失。我相信大多数陈琦贞的乐迷都有过在一片轻松温暖的旋律中被某句无比简单的歌词击中心尖的经历,但现在我们却不得不用细读的方式去揣测陈琦贞所做出的真正表达。但就像升哥说的那样:陈琦贞是有料的,毕竟毕业于政大哲学系;而她在做这张专辑时也是用心的。我并不认为只要用心就可以成为无视一切的免责金牌,就像我不认为电影音乐的商业化可以等同于大拍广告MV,大唱口水歌。我只是有些过于敏感地在众多对于陈琦贞的批判与叱责中嗅到了青春荷尔蒙的味道。



在我曾聆听的关于青春期精神分析的讲座中,来自法国的卢梭先生(拉康学派)告诉我:对于处于重新构造主体进程中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往往会在此过程寻找一位“大彼者”来作为自己的偶像,以此建立新的父姓,新的符号与价值体系。而在讨论阶段,他则进一步指明:在整个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种“大彼者”的转移,也即符号价值体系的转移。这样的一种转移往往是迅速而暴烈的。换言之,一旦青少年找到新的“大彼者”,那么他将会异常决绝地抛弃旧偶像,旧的大彼者,而该种抛弃的方式除了完全的把自己与之隔离,还包括对旧偶像旧体系的谩骂。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一个满嘴粗口的朋克可以迅速地穿上皮衣蓄起长发,离开革命转而寻求撒旦的救赎。这包含了一种彻底的决裂。而这种决裂却也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过往的自己?

大多数青少年都选择了决裂的方式来否定和拒绝从前的自己,他们避免谈起过往的爱好,担心被发现曾经进入过现在厌恶的符号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分裂并不会有什么后果,但在某些特殊的境况下却也会造成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且,这样的一种分裂足以表明:产生分裂的个人依然是把自己的主体建构或绑定在文化符号体系之上,而这样的符号体系是会在时间的纬度上随着社会变迁而缓慢漂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我们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处于青春期状态的成年人(法定意义上);而这也必然意味着有同样数量的人渡过了那所谓没有青春的青春。

二月,尽管依然春寒料峭,来自兰州的低苦艾却已然唱出《我们不由自主的亲吻对方》的温暖歌谣;Tizzy Bac 选在情人节前大声宣告《如果看见地狱,我就不怕魔鬼》,殊不知既看见了一箱 OJC(original jazz classical)原盘,又瞄到《生命希望工程》这一系列(13碟)921 灾后小学重建纪录片的我,只想站在高岗上无奈地大发感叹:真是什么事都叫我分心呐!

ARTS&MUSIC 音乐

观察员 成庆 (波士顿, veron.cq@gmail.com)

2 月份应是国内乐迷幸福的时光,芝加哥交响乐团(CSO)的访华演出据说相当精彩,以至于一位认识的乐迷前辈不停怂恿,要我去芝加哥一睹其风采。而且我也刚刚得知,CSO 在华演出的马勒第六交响乐居然是这首曲目第一次在华上演,想起数月前初抵波士顿时拿着“学生卡”连续听了两场马勒第六,当时只觉美矣,未料曲目背后,还有这样的背景。

美国五大交响乐团访华,波士顿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都早已陆续来过,如今芝加哥交响乐团姗姗来迟,毕竟圆了中国乐迷的一个梦,不过这样的美梦之后,大家心里或许清楚,古典音乐的梦对于国人而言,其实才刚刚启幕。

之所以这般说,是与个人感怀有关。来波城数月,BSO 的演出也听了 10 余场左右,伊始的震撼如今渐入平淡,BSO 的风格与音色也随着越加熟悉让我多了些挑剔,比如演奏德奥作曲家时铜管部分不够雄浑,弦乐部分过分明丽,甚至有时

还以为自己跑到了巴洛克演奏厅，等等。另外，如此高强度的听乐其实于我而言，体验也是广种薄收，熟悉的作品自然可以马上洞悉演奏的特色与优劣，但是那些从前几乎完全陌生的曲目，只靠一遍，远远无法洞悉它的魅力所在。

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乐迷，爱好而已，未必太过当真。但是国内的音乐教育如何能靠吉光片羽般的演出，培养出本土的音乐人才，无疑才是最让人疑虑的。前几日听演出，恰好与隔壁一对老夫妇搭话，不问则已，一问才知他们从1946年就开始听BSO的演出，风雨不断，让人诧异。对于他们，音乐会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这座城市的自然选择而形成的文化生态而已，他们不依靠这种活动证明其社会阶层的身份，也无需以发烧友的狂热心态搜奇罗珍，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场音乐会。当然这一切，对于国内的乐迷而言，未必太过奢侈。

继《爱乐》改版之后，《人民音乐·留声机》也宣告停刊，国内的音乐文化的生态实际上日趋恶化，接踵而至的演出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文化形象工程的环节而已，不小心让我等乐迷沾染几丝濡沫，何乐之有？

牢骚之后，需要简要的报告本月的一些演出。



Kurt Masur

今年是门德尔松门德尔松诞辰200周年，各地都有不少纪念演出，最近BSO(波士顿交响乐团)就专门演出了一场门德尔松作品的音乐会，担纲指挥的是大名鼎鼎的库特·马祖尔(Kurt Masur)。

说起马祖尔，不得不说下此人的传奇经历，这位年届80的指挥家早年在东德的职业生涯本来可谓一路顺畅，从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到后来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指挥的都是一流名团，声望也极高，是当时东德音乐界的标志人物。1989年，莱比锡的一些音乐家被政府逮捕，马祖尔一反过去的温顺角色，马上向文化部长提出抗议，促成公众与政府进行会谈。在后来发生的大规模游行中，他则号召群众和平游行，最终迫使警察与游行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就在这之后一个月，柏林墙倒塌。

就当晚BSO演出的曲目而言，苏格兰交响乐与意大利交响乐虽然也属于常演曲目，但是比起贝多芬、勃拉姆斯等德国作曲家，显然并不算太出色，用一些学者的话说，门德尔松的曲目典雅、精致，但是却往往让人容易厌倦。

不过这些对于我，却变成一些难得的优点。我不熟悉他的交响作品，这样他的浅白的浪漫主义相反能让我感受到其直白魅力。比起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这些复杂曲折的作曲家而言，门德尔松犹如读一篇散文，可以只读上一遍，却会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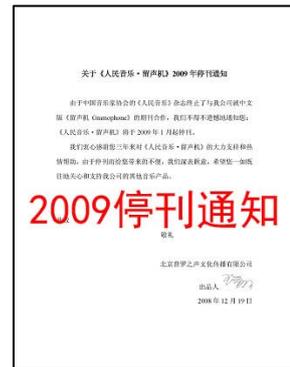
春风扑面。当晚马祖尔的指挥也极为华丽，BSO的明丽音色也极适合门德尔松的作品特点，弦乐部分温暖宜人，慢板乐章的歌唱感也让人十分沉醉。

这就是门德尔松，他的最大魅力，以中国人的眼光，应是一袭白衣翩翩公子，虽然文雅风流，毕竟是时代人物。不过，门德尔松或许可以这样应答，我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是那毕竟曾经属于我。

另外一场需要重点报告的，是波士顿的一个本地巴洛克乐团Sarasa Ensemble。当晚演出地是在老地方，哈佛的First Church。说来好玩，来到波士顿这么久，我没有一次专门拜访过哈佛这座学术“圣地”，反而是不停的来这附近听音乐会，而且几乎都是夜访，哈佛的真容从未得见。一夜，冬雪绵绵，我穿过哈佛Yard，前往Sander Theatre，在园中的积雪深处中寻找道路，一不小心，瞥见身旁一尊塑像，定睛一看，原来是无数人景仰的“哈佛先生”。黑漆漆的园中此时仅我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哈佛先生相遇，心里默想，就当是张良履桥端的美国版传奇吧。

当晚曲目其实颇为繁多，亨德尔的康塔塔、弦乐组曲和二重唱，普塞尔(Purell)的小提琴奏鸣曲与咏叹调，下半场则是重头戏，佩尔戈莱西(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的“圣母悼歌”。说来有趣，这位只活了26岁的作曲家，虽然以喜歌剧闻名，流传最广的确是这首宗教圣歌。作品本身是为圣母的七天追悼日而作，内容大体则是圣母对耶稣受难的哀思之情。

当晚演唱这首圣歌的是Dominique Labelle与Michael Chance，虽然不大得闻，但是均是歌剧界的一流人物。以Labelle为例，喜欢巴洛克歌曲作品的朋友，自然也会常常遇到她的一些录音。据我所知，她演唱的Arminio还曾获得过亨德尔大



奖。

其实上半场时，这二位就已小露身手，Labelle 作为女高音，声音在高音区稳定且清亮，Michael Chance 这位高男中音则是情感充沛，有些片段让人为之动容。“圣母悼歌”开篇就是“十字架下，她驻足啜泣，临终时刻，守候在耶稣身旁”，这样的意境，对于基督徒而言，自然熟悉，加之小提琴铺成的缓慢庄重的氛围，这种渲染手法尽管常见，却能轻易打动人心。欣赏这样的圣歌，歌词往往并不重要，关键之处则是演唱者的姿态与声音的表现。歌剧唱词，常常是将单词拆分在相等的音符上，加之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等，现场聆听，根本无法洞悉内容，这需要你事先熟悉场景与背景的细节。而演出时只需关注歌手如何通过声音表达情感，“言词”反而显得无足轻重，音乐在这样的情境下跨过“言词”，才昭示出精神超越性的维度。

我非信徒，不过在这样的情境下，常常感动不已，常觉自己能触及到那种人世的悲悯与基督教中的渴望救赎的情怀。两位歌手的演绎相当精彩，有些时

刻，空气都有如凝滞。我最偏爱则是女高音咏叹调“她凝望着高贵之子”(Vidit sum dulcem Natum)这段，因为承接上段那凄凄切切的二重唱，这段咏叹调人性温情极明显，悲悯之情的间隙，温情如清泉涌出，再铁石心肠的人儿，怕也禁受不住吧？

那夜还有一花絮可与众位分享，唱到近结束时，我的视野稍微偏转，看到舞台左端几排的观众中间，一位美国中年妇女正不紧不慢的穿针引线，似是编织一条围巾，让我差点笑出声来。并非觉得不合时宜，反而觉得，这种“圣母悼歌”映衬下的日常生活片段，反而是人世最切实的图景。也让我仿佛听到母亲当初一边摘菜，一边嘲笑我放的音乐，“那都是些什么鬼哭狼嚎嘛！”



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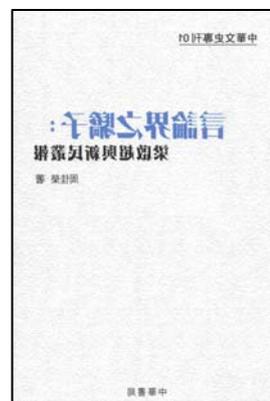
HONGKON 香港

梁启超：文化启蒙的舆论骄子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 fei.yan@green.oxon.org)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梁启超被赞喻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他那中西汇融的理论、气势磅礴的议论、锋利感人的文笔，征服了一大批知识者，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话语系统。所谓“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严复就曾经称梁启超为“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新民丛报》是 1902 年至 1907 年间由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所办的刊物，它对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一个政论报刊的范畴，几乎启蒙了一、二个世代的知识青年。在此之前，梁启超曾经是上海《时务报》的主笔，宣传变法思想，在戊戌变法时期已崭露头角。1898 年戊戌政变后，他流亡至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对西方、“西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新民丛报》创办的缘起，根据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乃是鉴于中国此前的报纸，“非删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殆幼稚时代势固有不得不然者耶。本社同人慨于是，创为此册。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矣。”梁启超进一步认为，政治制度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更深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



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发表了约 11 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在《新民丛报》连载四年。自此，梁启超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新民丛报》在梁启超一生所办多种报纸中，是最为成功的，是他办报事业的巅峰之作。该报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 20 人的阅读。正如许纪霖所言：“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梁启超

这本书的作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攻读博士期间，完成了《新民丛报》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研究，对梁启超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将其归结为“文化意识型的政治家”，或者“政治意向型的文化人”。因为“他对民族和国家怀着抱负，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有所寄望，我相信只有这一类型的历史人物，可以真正为后世引领前路。”

全书共分成上下两部分。上篇记叙了《新民丛报》的刊行始末，并且通过论述《新民丛报》的内容和论旨，以及中国知识阶层对其接受程度和排拒原因，解答了新旧思想的交替、君主立宪论调与革命主张的对抗等问题；下篇则重点讨论《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并分析了其时急时缓的思想转变的因由。该书附录中所收录的《梁启超的署名和笔名》、《梁启超生平大事年表》及《梁启超研究书目解題》，也均是研究梁启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在作者分析看来，《新民丛报》在维新国民、维新国家的主旨上，主要是从德育和智育入手，教育为主，政论为附。因此，从这点“以政论为附从”出发，《新民丛报》在当时突破了逐渐趋于定型的政论报刊的格局，办成了一个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和派别见解的综合性报刊，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杂志。它对于介绍东西方的新学理、新观点的努力，从来没有中断过，所设列的栏目，也包含图书、时局、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财政、法律、小说、文苑等多方面，所以它的影响可以既不限于一个政见的派系，也超越出了政治、

思想的范畴，而受到读者的欢迎。

值得注意的，对于《新民丛报》的评价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主流观点一般均从研究辛亥革命的角度出发作解读，认为该报纸与《清议报》一样，同是变法维新的余流，是保皇派的代表性刊物，虽然初期在传播新知识、新学说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对于革命思想的兴起有间接的帮助，但同时也是革命派的一大阻碍，“成为思想战线上革命派所面对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此，作者的看法是，对《新民丛报》及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评价，必须相嵌于 1902 年至 1907 年间中国思想界急剧转变的大背景之中，“近代中国史上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后者既为前者的继续，又同时为前者的反动；关键在于当时和后来都强烈判别每一个运动的正面或反面意义，例如从变法运动的出现而否定洋务运动，又从革命运动的出现而否定立宪运动，完全不顾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全面行，所以历史评价必然会有偏差。”

由是，作者将《新民丛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根据其阶段的特色和表现加以分析。1902 年为《新民丛报》的“激进期”，梁启超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号召对外应付帝国主义的凌逼，对内抵抗满清封建统治的压制。为了建设新国家、新民族，梁启超将破坏作为“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而在破坏的种种方式之中，并不排除革命的可能性。为了更多地培育合格的中国国民，《新民丛报》在此阶段大量地引进了西方新鲜的理论、观点、标准和尺度，使读者在中国古圣昔贤之外，可以明了西方国家的思想和道理、原则和方法，因此应该给予其启蒙功劳高度的评价。1903 年初至 1904 年中为《新民丛报》的“还原期”，与梁启超关系较少。但其前半段承激烈言论之后，仍然深受读者欢迎，后半段则因梁启超游美归来，看到美国施行民主政治的许多弊病之后，自感中国没有美国立国的条件，不能行共和政治，言论就此从激进趋向温和，既不向往共和，也不放言革命。“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足以误国”。1904 年中至 1905 年底，为《新

民丛报》的“定型期”，政论文章较少，学术文章开始占据主流。1905年8月，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26日，创办刊物《民报》，并在创刊辞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报》从一开始即针对《新民丛报》的民主立宪论点进行批判，宣扬排满革命，这直接促成了《新民丛报》从1906年至1907年对《民报》铺天盖地的激烈批评之“论战期”。当时梁启超的思想基础是坚决反对革命，推崇君主立宪，认为“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强调这是“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由于革命是当时解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进步思潮，因此作为君宪派喉舌的《新民丛报》注定在争取民心归向方面落败，而《民报》也取而代之成为最畅销和最具影响力的报纸。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君宪思想的时代亦宣告结束，革命派思潮正式成为中国言论界的主导。

整体而言，作者认为，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这几年间前后互异的言论主张，正好反映出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大趋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民丛报》前期代表的是进步力量，后期相对于落后保守的势力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从思想发展而言，《新民丛报》所展现出的思想学说之广阔，在当时罕有刊物可以匹敌，几乎可以说是新中国早期的知识源泉，是中国新知识青年的思想摇篮。而至于《新民丛报》在文化启蒙工作上的贡献，“并未随着二十世纪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时至今日，仍有待继承和发扬。”

对此，1912年11月10日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曾写到“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赞：“《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多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明。”当时的很多青年，如鲁迅等人也都十分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氏的文章“能打动一般青年的心”。郭沫若在《回忆少时》时曾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而在青年时代曾不问时事的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也承认梁启超“启迪国人，功诚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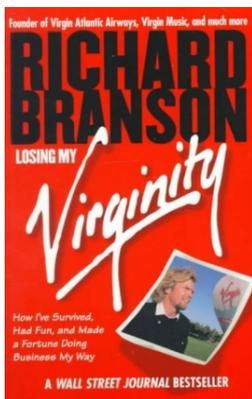
梁启超无愧为中国“言论界之骄子”。

周佳荣著：《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与新民丛报》，香港中华书局，2005年6月。

ENGLAND 英格兰

谁误读了布兰森？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以一位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标准看来，我认为英国维珍航空（Virgin Atlantic）的班机食物算是相当不错了。起飞前提供汽水和低度酒，空服员在丰盛的三餐之间还不停地给你塞精致的小点心和水果，生怕乘客的味蕾在旅途中有一刻闲着。比起对食物偷工减料的荷航、法航和汉莎航空，维珍起码可以满足部分好饕之徒胃里潜藏的愿望。

不过，即使用数量可观的饭后冰淇淋堵住乘客的嘴，也难保西方娇生惯养的中产们不会对贴着维珍标签的客舱食物指指点点。上个月，一位家居伦敦的广告公司艺术总监在乘坐了维珍航空的班机后，写了一封投诉信给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并拍下数张机上食物照片以证明航班供应的食物太差，抱怨他的飞行行为“烹饪地狱之旅”。

布兰森还是一贯风格，第一时间打电话道歉，并将邀请对方来后勤部门，亲自协助工作人员为航班挑选机上食物和葡萄酒。尽管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这位投诉者声称自己并非布兰森先生的“托儿”，但有意无意间，他确实也充当了布兰森这位善于表演的老板推广企业品牌的一粒棋子。

自然，贵为集团董事长的布兰森躬亲电联投诉者，并不是因为这事“篓子大得惊动了领导”。布式骨子里从来都是一个以“群众”和“草根”自居的商界造梦人。资深商业记者德斯·狄洛夫（Des Dearlove）在《布兰森商业帝国》一书中写

道，尽管布兰森出身于伦敦以东，有着公立学校的教育背景、时髦的口音和无尽的财富及权力，但普通民众却认为布兰森是他们中的一员。布兰森与其他 99.9% 的大公司经营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和气待人，他每个月都会亲自打电话给至少 50 名顾客询问公司的服务情况，或者干脆跳上维珍公司的航班与乘客聊得火热、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他曾经化妆穿上空姐的制服为人们提供饮料。与这些不寻常的“异闻”比起来，回复一个投诉者电话的举动，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自上世纪 60 年代创办《学生》杂志开始，布兰森向来被人视为一位“嬉皮士资本家”。众所周知，他穿着不修边幅，将工作与玩乐混为一谈，常靠一些非常规举动来将市场的水搅浑，兴致所至时，更会做出独自驾艇横渡大西洋和乘热气球环球旅行之类吸引眼球的“壮举”。但如果仅把他成功的原因“误读”为善于夸夸其谈和独特的个人魅力，似无助于我们了解布兰森本人及其背后庞大商业帝国的另一面向。这样的布兰森或许还是那个敢于签下朋克乐队“性手枪”的唱片公司老板，但这还不足以使他成为那个在商业界家喻户晓，能长期进入《福布斯》杂志富豪榜的布兰森。正如狄洛夫在书中告诉我们的：布兰森的意义在于，他“创造出将叛逆与商业相融合的新型发展模式，并且发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品牌运营方式。”

而支撑这种模式的，除了大胆的想法力以外，还需要绝对冷静的判断和迅速做出决断的能力。布兰森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无疑包藏着某些更为严谨的东西。

作为消费者最为认同的英国品牌，维珍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离经叛道的形象登上市场的舞台。在公司最初的岁月里，维珍 (Virgin) 这个单词曾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而不被政府允许注册，这或许也暗中成为维珍唱片日后签下受到争议的“性手枪”乐队的精神源头。当其他公司还在把大笔资金投入广告宣传的之时，布兰森早已悟透：与其花巨资购买媒体的版面，莫如自己策划、制造新闻，进而免费占据媒体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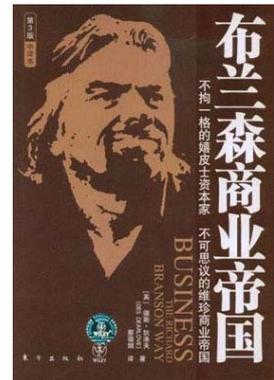
照狄洛夫的看法，无论布兰森开辟专栏还是与员工一起穿着蕾丝吊带裙跳舞，目的都无非是为了迎合媒体口味而制造出的“娱乐精神”。在对待媒体的问题上，布兰森是个机会主义者。当海湾战争前夕一架英航客机被萨达姆武装力量劫持时，他竟下令维珍公司的一架飞机待命，随时准备前去解救人质。

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维珍与竞争对手英航的身上，英航多年前在向国际航空公司转轨的过程中，决定将英国国旗从机身标志上抹去。维珍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布兰森这位“爱国者”下令将英联邦旗帜纳入机身标志，并称如果英国航空不愿挂出国旗，那么维珍愿意效劳。这一招，使得航空飞机上油漆未干的英航失去了英国媒体的亲睐。而在维珍利用“反垄断法”与英航打的一场笔墨官司中，布兰森通过拍摄内幕纪录片等方法再次成功利用舆论造势，使得英航最终不得不赔偿维珍 500 万英镑。

与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不同，布兰森没有发明过任何革命性的创新产品，也谈不上什么业界先锋。让人们一定程度上“误读”了布兰森的，恰恰是布兰森的竞争对手和那些不明就里却狂热地崇拜着所谓“个性企业家”的商界追星族们。认为媒体上的出现的形象直接等于实际的商业操作，毫无疑问是天真的，并且最终促成了维珍集团所希望看到的一幕：他们的总裁成为了一名商业“十字军战士”、一位可以向各个阶层的人发言的多面手。但是这位每天都必须处理数十个预案的另类老板，最常打交道的正是他的崇拜者们所反感的事物：古旧而杂乱的英式办公室、不间断的商务会议、与合作伙伴和对手不断的唇枪舌剑……而这些又岂能是一位仅仅“在路上”的嬉皮士所能考虑的？

事实上，理查·布兰森，这位拥有全世界年轻人所向往的 3F——名声 (Fame)，财富 (Fortune) 和乐趣 (Fun) 之一的“帝国国王”，并非一个只知道在聚光灯前作秀的厚颜无耻的商人。他每一次看似离经叛道的举动，背后无不经过了只有一颗“精英大脑”才具备的精打细算。

[英]德斯·狄洛夫 (Des Dearlove) 著：《布兰森商业帝国》(Business The Richard Branson Way)，蔡蓓娟译，东方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BOOK REVIEW 书评

小丑的提醒(读诺曼·马内阿札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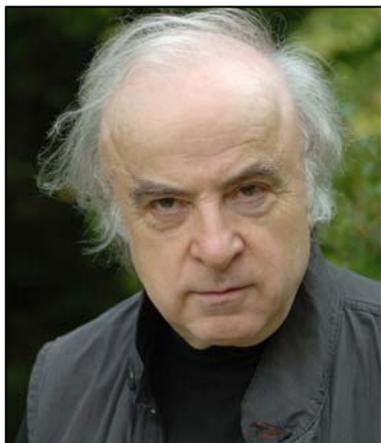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peessoa1935@gmail.com)

1997 年, 流亡西方已九年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随他的顶头上司、美国巴德学院院长利昂·波特斯坦一起访问祖国。对他们这“一对”, 马内阿称之为“典型的一对, 花脸小丑和白脸小丑”。他这位“花脸小丑”在飞机上给他的同行解释, 所谓的“花脸小丑”就是贱民、失败者, 为了取悦观众而总是被踢屁股的人, “白脸小丑”则是老板、主人、权威(《流氓的归来: 一部回忆录》, P273)。

马内阿在其另一部随笔集《论小丑: 独裁者和艺术家》中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小丑观——或者说是在进一步完善了小丑观, 因为他的“论小丑”是“读费里尼文章有感”, 但触类旁通, 费里尼大师关于权力与艺术之间的观点被马内阿用到了他的大部分文章里, 在这位曾经是罗马尼亚异议分子、流亡作家的经历中, 权力与艺术的关系、白脸小丑与花脸小丑的作用, 几乎能说明一切问题。但对中国人而言, 无论是谈论的话题还是谈论方式都显得格格不入、

“骇人听闻”。姑且不论当面指出自己的衣食父母为白脸小丑是多么“失礼”的行为(在中国的语境下, 恐怕还要冒“失业”的危险), 只说同样也算艺术家的利昂·波特斯坦(是一位指挥家), 就因为他是巴德学院的院长, 是老板、主人, 于是在他与马内阿的关系中就转变成了白脸小丑, 从花脸小丑转变为白脸小丑, 掌握着权力的白脸小丑。

1986 年马内阿正好五十岁, 知天命之年流亡西方, 三年后, 他生存半生又激烈地反对不已厌恶之极的国家垮掉重装上阵。“小丑观”及其衍生阐发的“马戏团”观点, 在马内阿对罗马尼亚过去的回忆将来的思索上, 在对当权者、友朋和亲人的评价上都“居功至伟”。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罗马尼亚的掌权者齐奥塞斯库夫妇, 如果说马内阿所赋予的白脸小丑称号确实辛辣无比鞭策入骨, 那么更应该看到, 这位拒绝合唱(甚至拒绝表演)的花脸小丑对整个马戏团的冷眼旁观是何其的深刻, 形形色色的人物, 稀奇古怪的规章制度(如《审查者报告》一文所言)——难道只有卓别林这位花脸小丑扮演的希特勒、给了马内阿切肤般记忆的齐奥塞斯库才是白脸小丑吗? 马内阿将小丑观的观看方式从独裁者一直往普通人身上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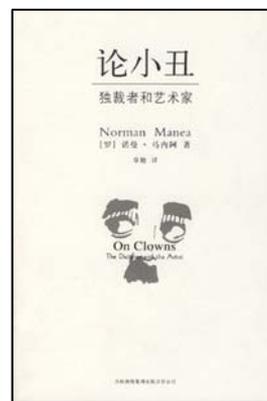
诺曼·马内阿

正如马内阿所写道的, 他读费里尼谈小丑的文章每有复仇般的快感, 读马内阿的“论小丑”或许没有那种快感, 然而它能提供一种观看坐标(就像前引马内阿与利昂·波特斯坦的一番对话), 让读者得以反思自身的身份, 对于每天各个“系统”里的“马戏团”及其产生的悲喜剧, 我们自身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定义自己, 就像费里尼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定义为花脸小丑, “但我同时也是白脸小丑”。举个活生生的例子, 那位极力反对《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的艺术家在今年上半年的种种表演, 恰好是马内阿“小丑观”的最佳阐释——确实大部分观众都被“取悦”了, 甚至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艺术家”的良好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 五十岁以前的马内阿虽扮演着不合拍的花脸小丑, 然而却是世界范围最值得称道的花脸小丑。他曾“极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政变知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见《作者补记》), 但当他履行花脸小丑的职责时, 他给了观众警醒, 而不止是笑声。

《论小丑》一书内容单薄, 却和篇幅巨大的《流氓的归来》一样含义深远, 富于思想。马内阿大概是使用问号最多的作家之一, 这些疑问, 反问值得读者明年, 后年去消化。关于他的译介最早见于《书城》杂志 2006 年 6 月号, 在未读其作品之前, 很难理解这样的评价:

“我们读马内阿的著作, 一字一句地咀嚼他的文字。我们惊诧他精湛的语句, 惊叹他裸露的坦诚, 惊赞他深刻的思想。”(梁禾, 《关于诺曼·马内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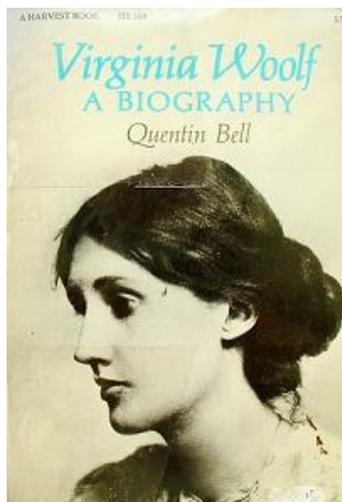
[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著:《论小丑: 独裁者和艺术家》, 章艳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 3 月。



BOOK REVIEW 书评

不快乐的作家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给伍尔夫夫人(Virginia Woolf)写的传记真不少,谈她的文学,生活,女权观念,文学史观念,不一而足。至于那个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更是给人写传记用的,不光成员都是名人(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等等),而且彼此关系暧昧,故事多多。

手里这本传记比较特殊,因为作者贝尔(Quentin Bell,1910-1996)是伍尔夫夫人姐姐的儿子,跟伍尔夫圈里人混得太熟——熟到他自己承认,简直没法写。贝尔下笔有点尖刻,不过第一手资料多多,很难得。

而伍尔夫的特别不仅在于作品,更重要的是,她在生命后期经历了战争——当然,不是参与而是感受。这也很不一般了,对一颗敏感的灵魂来说,足够让人忧郁不能自拔。古往今来,乱世是常态。不过,坚强从来不是她的品质之一。她一生都不穷困,但一直担心自己破产,也怕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好评,怕到神经质和幻听。不仅如此,她还嫉妒别的好作家比如劳伦斯。丈夫安慰她不要介意批评,要接受这个现实,她想必也乐意,但实在做不到。她把丈夫的评价也看得很重。一次精神危机后,她让丈夫看《年月》,紧张地等他的评价,丈夫看了,觉得是失败之作,但还是告诉她,“非常好。”如果不这么说,也许她会自杀。总之,伍尔夫其人充满作家的弱点或干脆说,人的弱点。虽然她非常精神化,能够藐视物质,但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文学成就,她是活不踏实的。这个人实在不能算高尚博大有力,但也许这令她不快乐不踏实的虚荣,是成就她的一部分?有些人,偏偏因为自我囚禁而成就。

其实,即使没有战争,她的生活也是创伤累累。几位朋友的自杀、去世,给她撒下的孤独和悲哀,在传记中都有真切的描述,看得我也唏嘘不已。这本传记里有很多照片,看上去她潇洒优雅,抽着烟,站在花园里,跟朋友高谈阔论。她有汽车,有保姆,丈夫把早餐端到她的床上——看似无可挑剔的环境里,她不能克制地焦虑着,多次精神崩溃。在布鲁姆斯伯里中,最后一次聚会,最后一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世界在崩溃。他们那个圈子,自鸣得意、自命不凡,但在生活的离合悲喜中,并没有什么特权。大家都是情感和形势的奴隶。伍尔夫最后的日子里,丈夫给她安排医生,一次次地约。夫妇已经决定,如果希特勒的军队来临,他们就一同服毒。越来越多的轰炸消息传来,一次次地看病之后,她确信自己不会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遗书和自沉。丈夫追来后,看到的是插在河畔的她的手杖。自杀她演习了不止一次,终于成功。

通常来讲,“名人传记”不仅如同任何写实记录一样写下世态炎凉,还往往因为触及丰富的灵魂和作品,展现了世界的分裂。“布鲁姆斯伯里”圈里的人,泛泛看上去,一个个趾高气扬、孤芳自赏,但走近每一个人看,他们成就自己的过程都不简单,而且给后人留下了一些财富。群体是难做的,历史上各种“帮”和“党”,其成员们作为“存在”来说可能互相支持温暖,而作为整体却很可能因关系太紧密、协作而往低端靠。在我看来,“布鲁姆斯伯里”是个特例,其成员的骄傲、个性让他们彼此若即若离甚至相斥。这本身也正是精神世界的缩影:互相不买账、甚至敌对的天才,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但谁也没把这个世界改变到完全是他(她)主张的样子。他们只是各自说服、吸收和改变了顺应他们精神的一小群人。世界总是布满杂色的颗粒,要向谁统一,看来是不可能的。

拉拉杂杂记录了一些读书的印象,总之是感念世界的复杂和“不快乐”。作家、知识分子往往是不快乐的,甚至从某个角度看,他们都是自寻烦恼之人——他们要么目睹更多的惨烈真相,要么就是因为个人原因,神经过于敏感脆弱。我们周围有很多快乐健康的人,那么如果能够选择,你乐意做谁?相当多的时候,快乐来自对环境的顺应;从个体来说,我支持和赞美任何人的快乐,但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如果只知道肤浅的快乐,那么群体的容错力就很低,面对灾难自我调整发展的能力也很低。灾难不可预料,只知快乐的人,从来没有面对过生活之深刻复杂。环境一变,快乐的来源一断,怎么活

下去？文学、艺术这类充满痛苦、忧伤和失败感的东西，提供了对生活的解释。人如果不能顺应环境，至少还有内心可以伸展；心灵提供世界的“冗余”，并且是世界的缓冲。我们读过无数这样的故事，某作家养尊处优，可是对世界的绝望感会超过穷人。可见他的内心不能顺应世界。这种不顺应形成的张力，一部分就发泄在作品中，而顺应的人加强着这个世界。

所以，任何普通正当的快乐，仍然会被支持和赞美，但是面对少数人的不快乐，可以这样去看：他们保护着这个世界的丰富和力量。

传记很长，从1882年伍尔芙的出生写到1941年去世，其实是从她的父母、家族和伍尔芙脆弱易感的童年写起，充满细节，以至于伍尔芙的感情波折——跟男人女人的，跟她最在乎的人——姐姐瓦内萨和丈夫伦纳德的——都显得破碎、无始无终。总结别人的人生是困难的，尤其对丰富的灵魂而言，世界总是布满痛苦的颗粒。

Quentin Bell: Virginia Woolf: A Biograph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OOK 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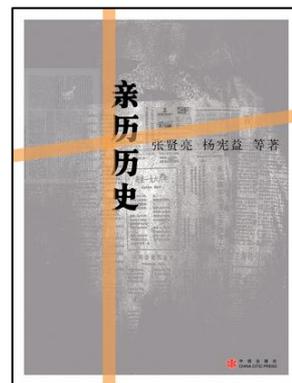
“史无前例”不是史无前例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新任美国国务卿、上上任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亲历历史》，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中国。最初在媒体上看到《亲历历史》（中信出版社，2008年）的书讯，以为是山寨版，见到书才知道是《收获》2005至2006年同名专栏的集结。时值“史无前例”发起40周年、结束30周年，《收获》开设“亲历历史”专栏，很有在纸上建筑博物馆的意思。漫漫十年在很多人那里是黑洞或者空白，真得“史无前例”——在历史中查无此事。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史无前例”的著作，我总是觉得多多益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亲历历史》这种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作为一个对“史无前例”有着初步了解的读者，《亲历历史》又让我感到意犹未尽，虽然是第一次阅读，却似曾相似，没有太多的“震慑效应”。

《收获》的专栏享有盛誉，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当数“文化苦旅”，从1988年第1期开始陆续刊发的余秋雨散文，已经把中学里的杨朔散文取而代之，引发无数未成年人认真临摹。“亲历历史”没有采取固定作者的方式，而是每次更换作者，由他们完成命题作文。按照常规，首选作者应该是余秋雨，无论与《收获》的交情还是与“史无前例”的交情，他都当仁不让。可惜，我把书从头翻到尾，没有找到他的名字。

《亲历历史》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作者，而是专栏理念。在现代媒体时代，文章不仅由作者完成，编辑也会以各种方式参与书写。张贤亮在《美丽》里讲到专栏的缘起，《收获》编辑给他打电话，告知杂志策划一个新的纪实性专栏，题目和希拉里的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张贤亮说写“反右”行不行，编辑回答还是写“文革”吧。这个简短的对话耐人寻味，“亲历历史”的历史不可能无边无际，需要作出界定，但是专栏把时间严格限定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无形之中腰斩了历史。或许是受这种命题作文的影响，《亲历历史》中的文章几乎以一种统一口径作为开篇，很多作者在第一句就划清时间界限。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开始》的第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费振钟《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的第一句话是：“1966年冬天，我在苏北的一个小镇上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朱正琳《铁窗岁月》的第一句话是：“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蓝英年《且与鬼狐为伍》的第一句话是：“1966年6月30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万方《遥远的“文革”》的第一句话是：“1966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儿，在北京女十二中上初中一年级。”晓剑《抄家的经历》的第一句话是：“1966年8月8日，天气炎热……”徐友渔《我的大串联》的第一句话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搞了半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方凌燕《逃离》的第一句话是：“1966年初秋。”严平《醒着的梦》的第一句话是：“1966年夏日的一天。”许志英《东岳“五七干校”》的第一句话是：“1969年11月10日下午，我与张大姐去火车站寄走了二十个干校



先遣队成员的行李。”

这种把“史无前例”视为创世纪的讲述方式，回避了历史的源流。根据郭道晖先生的回忆，1980年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副委员长谭震林拍案而起：“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他还历数了“抢救运动”、反胡风、反右等历次政治斗争，指出：“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参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谭震林否定“空前”一说，正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把浩劫纳入到肃反、“抢救运动”、反胡风、反右的历史源流。同样，“史无前例”并非史无前例，它不是1966年5月16日一天之间产生的，我们使用“史无前例”这个词，主要是指浩劫的程度。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概括：“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一部分作者，尤其是曾经被划成右派的作者，在文章之中不时有向前追溯的冲动，可是这种冲动欲言又止。张贤亮讲到他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格为“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并被劳动改造，对此他的自我评判是“很庆幸”，劳改队长的评判是“真走运”，因为他如果在外，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的双重攻击。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浩劫面前，成为“反革命分子”成了“很庆幸”或者“真走运”的事情，进劳改队“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蓝英年讲到自己曾经热血沸腾，是各种运动的骨干，但从1955年肃反的时候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怀疑揭发胡风的材料是深文周纳，中学的老师曾向他讲过延安整风的另一面，与几十年后韦君宜的《思痛录》相似，他在鸣放期间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仍然险些被划为右派。叶兆言在文章后记里提到，江姐曾经是他们这一代男孩子心目中最性感的女性，但他接着指出，虽然《江姐》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可惜这些值得细细道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文章里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简单交待之后就转入命题作文。

“史无前例”犯的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一个人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要与自己斗，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回首往事，会选择性回忆，也会选择性失忆。在这种“忆苦思甜”的记忆辩证法的支配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责任人。或者，所有的责任都被推给一个或者几个人，自己是坚持真理、毫不动摇、坚决抵制。相比之下，“反右”等事件虽然声势浩大，但与“史无前例”相比只是温水煮青蛙，青蛙是少数，更多的人参与了添水加柴的过程，这段历史往往不便回忆。以《收获》前任主编巴金先生为例，他在“史无前例”期间是一名受害者，但是在此前的“反右”等事件中则是以批判者的形象出现。经过“史无前例”的洗礼，在《随想录》里巴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思，承认自己也曾“投井下石”。虽然巴金的反思有着不少限度，但是像他那样愿意自我反思的依然是少数。确实，有一些人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可以放弃反思。

也有作者没有“忆苦思甜”，却进入“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逻辑。晓剑讲到自己从抄家到被抄家，只有一句话：“面对着别人抄我的家，我无话好说。”他用了大量笔墨讲述如何抄别人的家，还这样描写红卫兵手下的冤鬼：“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经以一举抓获在海淀区声名显赫的流氓集团头目‘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现在细想起来，这个‘凤’不过十七、八岁，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龙’们睡睡觉，绝没有吸毒、抢劫、拐卖妇女、欺行霸市、开发廊当鸡头之类的勾当，但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抓到后，一阵拳打脚踢，不知命中了哪个要害部位，便呜呼哀哉，尸体被扔在教学楼的楼梯下。”我不赞成强迫他人忏悔，也不主张面对历史一定要苦大仇深，但是晓剑文章中的这种漫不经心，不正是浩劫得以蔓延的“群众基础”么？张贤亮的一段话正好可以作为注释：“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如果过于敏感，只能走上患精神病、自杀或者反抗的绝路，为了自我保护，只能学会冷漠，但是冷漠又鼓励了参与浩劫的激情，激情和冷漠互相合作。

虽然《亲历历史》在反思历史的力度上有所欠缺，但除了晓剑这篇让人畏而远之，其他文章都可以起到扫记忆之盲的功效。我个人最喜欢其中三篇，作者分别是张贤亮、朱正琳、袁敏。张贤亮的小说有一些固定模式，比如“圣母”形象，但是他的这篇散文《美丽》改变了对“史无前例”的标准叙述。他明确表示难以从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进行观察，

而是很理解劳动群众的“闹着玩”心态，张贤亮没有为“史无前例”翻案的打算，他指出这是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疏离政治、玩弄政治”。这篇文章讲述了大量常理之外的细节，比如性骚扰以女性对男性居多，比如押送张贤亮的人嫌枪太重硬把枪塞到张贤亮的怀里让他帮忙扛着，比如为了进城看热闹战士们争夺参加公审大会名额张贤亮提议把自己的陪审名额让给战士，比如四个中年人押着一个十岁的“反动学生”参加公审大会接受教育。《美丽》超出了张贤亮的那些小说，也再次证明了现实比虚构更有想象力。朱正琳在《铁窗岁月》里讲到自己为了保外就医不惜自残的大无畏精神，如果好兵帅克在天有灵，也会倒抽一口冷气。他以一种“正讽”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心理历程，少年时代从革命回忆录里获得“铁窗情结”，后来终于“梦想成真”看见“向往已久”的铁窗，遗憾的是窗户太小太高，不太可能重现电影里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袁敏的焦点是 1976 年，在这个通常认为尘埃落定的年份，几个少年因为“总理遗言”遭遇灭顶之灾，伪造“总理遗言”的当事人彻底修改了自己的记忆，至今坚信那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只有记住“史有此例”，“史无前例”才有可能不再重现。记忆是不可靠的，但这不是拒绝记忆的理由，不给记忆规定标准答案，让记忆校正记忆，这是反思的前提。浩劫虽非空前，希望它能绝后。

张贤亮、杨宪益等：《亲历历史》，中信出版社，2008 年 9 月。

OBITUARY 逝者

约翰·厄普代克

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xiayouzhi1997@gmail.com）

媒体出身的小说家里，我最欣赏的三个人都成了大器。海明威和马尔克斯都拿了诺贝尔奖，厄普代克如果不是患有皮肤病，有可能在《纽约客》杂志里作一辈子编辑，很多人认为他也应该拿诺贝尔奖。一个作家的成就并不需要靠诺贝尔奖来衡量，但如果听说厄普代克拿到这个奖，我也不会吃惊。实际上，关于他要得诺奖得传闻是每年美国文坛最津津乐道的小道消息之一。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1月27日，厄普代克死了，终年76岁。他的死终结了关于他的诺奖竞猜。

对中国读者来说，一个美国作家的死无足轻重。厄普代克一生出了六十多本书，翻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不足10部，我认为他是海明威之后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但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一本短篇集。知道并且读过他的书的中国人大概不会很多，会喜欢上他的恐怕更少。他那种委婉的文字风格就像月光下的薄雾萦绕着树上的白色花朵，机智、美，但是充满曲折。要理解厄普代克的机智和美需要时间和闲逸的心情。这不符合我们的生活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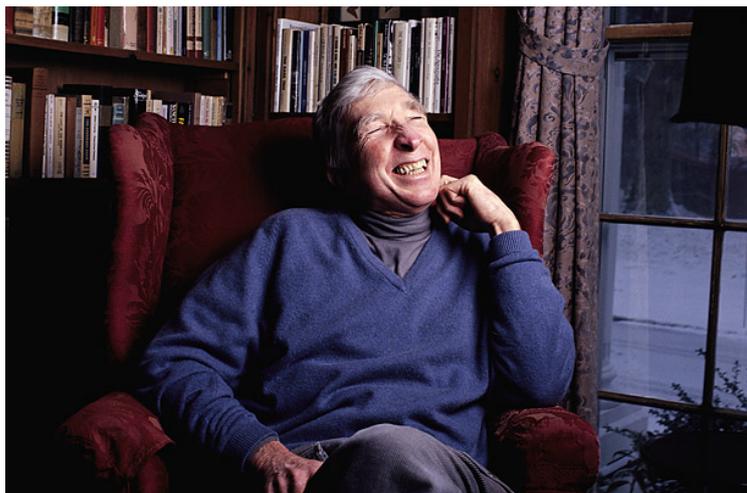
国际声誉这种东西和文学奖金一样，不足以让我们准确评价一个作家。美国人对厄普代克没有得诺奖有点耿耿于怀，大概有一点说不出口的自大情绪。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金，都已经被厄普代克收入囊中，其中包括两次普利策奖和两次国家图书奖。也许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有一些思路古怪的人，认为诺奖不颁给厄普代克，就是对美国文学界的品位视而不见吧？但对厄普代克本人而言，诺奖不过是锦上添花。有人要说，不然，厄普代克自己对诺奖其实也念念不忘，证据是他在小说里嘲笑过诺奖的评奖委员会——这自然也有可能。但在我这样资质平常的人看来，一个人能写出几十本如此美妙的小说，活着已经名利双收，区区一个诺奖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说，庸人不太能够理解那些真正有天赋的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只需要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找满足。尽管大多数人不能直接领会厄普代克运用英语的妙处，但即便经过翻译，我们仍然会被那种语言创造的才华所折服。比如厄普代克形容他笔下最著名的形象“兔子”哈里时说，哈里“觉得自己具有的是一种无害、消极的精神，一种平稳、渺小的声音，不想搞任何伤害，不想在任何地方落入圈套，也不想死”，我感到倦怠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句子是专门为我而写的。那些受过一点教育、总希望搞清楚自己状况的人，如同撵着自己的尾巴转圈的狗，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看清楚自己。这时候需要



厄普代克这样的小说家出面，用精确无疑的方式，把真相告诉我们。

说到这里，似乎厄普代克仅是极少数怀有特殊癖好的人群钟情的对象。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作家的普遍误解之一。他写了几十本书，每本书里都在重复同样的主题：出轨前的好奇和出轨后的倦怠，有人说他是刻画美国中产阶级灵魂的大师，其实他也是刻画中国某些个阶层灵魂的大师，虽然他写的故事并不是在中国发生的。好的作家就是这样，不管他笔下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增进我们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厄普代克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很少公开发表对政治的看法，但不代表他对一般人没有意义。



约翰·厄普代克 (John Updike 1932–2009)

世界上的诗歌、小说和其他各种体裁的文字已经数不胜数，但新的表达仍然被厄普代克这样的小说家发明出来，证明人的可能性远远没有穷尽。包括写作在内，智力活动就像发送到茫茫太空里去的探测器，关键在于证明某个星体的存在，而在于证明了人类的想像力尚未枯竭。厄普代克用极其机智优美的语言展示人性无穷多的可能，还写了很多书评，向读者推荐黄仁宇、苏童和莫言的作品在内的许多书籍。对知识的喜爱和写作一样，都是对人之可能性的一种证明。

WRITING&POETRY 写作·诗歌

怎样概括外观

王炜

仅是这泥浆已经很全面
较之途中滟潏的湖
它难说一些，却也什么都有了：
倒影，纹理，积淀。
也能为善感者保持
一些只处在描写中的东西。

来者尚年轻，好临观异同
泥地也起伏有致，似刚刚被拓过。
一会儿虚晴中，沼泽也能照耀我们，其光沥沥
这泥泞也分五色，怎不见入人山水呢？
我们登高，议论，拍照，临时区别四野
分头挑选能说的
小山上更有巨厦矗立，恍若月球立面。
含混的地面始终无法成形，无法辨别
但在隧道里踉跄多时后，刚冒头的一眼中
一切也能清楚地闪烁

泥泞也能从各个方向
主动黏附，乌合如地球概述。
我们在寒气中，缩紧了脖子
听着山下鼓风机的轰鸣声。
你的田野办法，睥睨我的夹叙夹议
我越矢口否认，也越是文学的，太文学的。

到一定时候我们的知识都发狠了
既然我们也都是含混的经历这些。
称道地面的话从来雷同
既然重要的也是临时的。
煤屑如薄暮，宛在水中央
山河若有似无，沿着事实的你我正彳亍。
这是初春。在盲目中，我们都有一些仿佛的，可以援引的
虹霓几乎吐露着，一个好的根据
但我沿着形象常是沿着丧失

我的谈话者呢？你哪里去了？

词语将我们完整地隐藏

凌越

词语将我们完整地隐藏，
而春天在激励我复苏，
激励我歌唱，
尽管听众早已溃散，
尽管我们的出场不过是汇入人流，
沿着古代的城墙我穿越城市，
风穿过整个冬天的厅堂它呼唤着我，
我知道我是词和物的幻象，
时间的冷漠和物象的忍耐将我逐出这个世界：
树木长出新叶；
明亮的窗户在眺望着灿烂的星辰；
人们静默地出门，然后回家。
嗨，几百本破烂的书籍造就的文明
嗨，松软的砂粒构筑的城堡
坍塌吧，我厌腻，让我从你思欲成病的土壤里破土而出吧，
在肉体中求得有限的快乐。
我是倾斜的大地的一部分，
我是孤立无援的星光。
绝对的善是残忍的，
务求平缓地平缓地进入睡眠——语言的同谋。
我是词语，我是神迹，

但有何荣耀可言？

TRANSLATION 译介

古拉格的美国人

亚当·霍克希尔德 (Adam Hochschild)

翻译：崔龙 校对：陈丹丹 (南京, Cheryl@live.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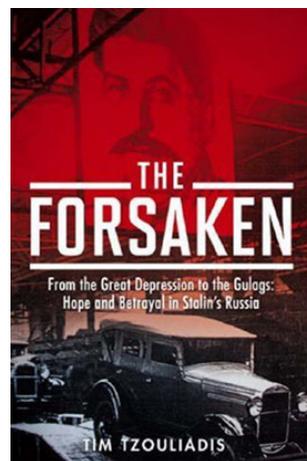
科累马山区位于白令海峡以西仅数百英里，是地球上最冷的人居区。在斯大林统治期间，大约两百万名囚犯被送往那里开采位于岩石般的冻土之下的富饶金矿。1991年，我在为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苏联人生存状况的书做调研时，曾到过此地，看到一些曾经的科累马劳改营，并采访了其中的部分幸存者，传说中这些劳改营是古拉格最死寂之处。在一个为建筑材料缺乏所困的乡村，所有数百个通公路的之前的劳改营早已被洗劫一空。仅存的几个是那些无路可达者，要去看它们，你得租架直升机。

我花了整整一天飞越这个荒芜的地方，其多砾的山坡上即便在六月还可见条状的积雪。我们降落后进了其中三个旧劳改营，发现了一些摇摇欲坠的木制放哨塔楼，围着高高的锈迹斑斑的铁丝网，以及，其中一个劳改营内部的禁闭室。它的房顶已经不在，但厚厚的石头墙还在；墙里面是一些被粗重的栅栏纵横交叉封闭起来的小窗户，那些交叉点又用粗铁条拧了起来。在科累马那一天的终了，当暮色如散开的墨汁一样遍及山谷时，我们飞返那个我暂住的小镇。我坐在两飞行员之间的座舱上。似乎在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凸凹不平的山脊的那一边，都是另一个劳改营的废墟，仿佛有个发怒的巨人把这些因数十年暴露在外而变黑的木头撒落在粗陋而荒凉的月面上。

在斯大林极权统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期间，没人能确切地知道有多少苏联人死于非命，但把被判处死刑并枪毙的、死于人为饥饿的，及这些在古拉格劳改营累死的人数加起来，权威估算的总数是大约两千万。与同一时期德国占领的欧洲所展现的巨大恐怖景象相似，当时的苏联有着几乎不可想象的死亡规模。但是，与纳粹不同，苏维埃在掌权的最初二十年，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世界范围内一部分渴盼更公正的社会的人们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支持的。蒂姆·楚利阿迪斯 (Tim Tzouliadis) 所著的《被遗弃的人》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采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来描述斯大林时代及其余波，那就是1930年代成千上万移居到苏联的美国人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生活其间的俄国人一样，成了牺牲品。他们的故事曾被零星地讲述过，主要是在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录中。但据我所知，此书是第一本全面的历史著作，它令人悲哀而又充满吸引力。

与无数同时期到达那里的西欧人一样，驱使这批美国人移民的是本国的大萧条和对于苏联有一种更好、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的信念。当时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业，数百万人排队领取救济粥，或者在失去家园、农场后住在胡佛村(Hooverville)简陋的棚屋里。难道不可能建造一个比此更具人情味的社会么？当然可能——而且很显然，苏联人正在这么做着。那里的工厂在招工——尤其对于熟练工人和工程师，他们提供似乎报酬不错的合同。而且据说这些工厂有托儿所、医务室和图书馆。尽管美国移民中的许多人在国内就已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即便没有社会主义信仰，也不难认为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人能够建立比危机中的美国更合情理的经济体。楚利阿迪斯挖掘出的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事实之一是，一本原为苏联小学生写的《新俄国入门：五年计划的故事》的英译本在1931年的美国畅销书榜上停留了七个月。

就在那一年，苏联对外贸易署发出广告，招收熟练的美国工人去苏联工作，10万美国人递交了申请。其中的1万被雇用；更有无数人凭旅行签证前往这个国家，希望入境后能找到工作。据1932年初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每周有多达一千个新的美国人来到莫斯科——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该报记者沃尔特·杜兰提(Walter Duranty)是个有名的亲共者，所以他可能有所夸大。然而，那年去莫斯科的移民数已经增加到足以使英文的《莫斯科新闻》由周报变为日报了。移民们带去





古拉格所设的集中营的铁丝网和了望塔楼

和著名歌手之前就已经是大学体育明星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任命为其中一个球队的荣誉接手。其他美国棒球队在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到亚美尼亚的耶烈万等地竞相涌现(顺便说一句,此书中的一副地图上标出了这些地点)。《被遗弃的人》贯穿着棒球这一主题,其中部分篇幅还追述了那天在高尔基公园打球的人后来的遭遇。

棒球运动迷住了俄国人,他们也开始加入到美国球队中,或者组建自己的球队,尽管他们认为练习偷垒多少有些资本主义。但是1936年忽然而至,大清洗开始了。在监禁、枪杀或流放了所有真正的政敌之后,偏执的斯大林开始把目标锁定在想象中的敌人身上,此时他静脉中流淌的仇外主义的血液也被触动了。抓捕浪潮席卷全国,据估计在六年时间里,苏联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八分之一被抓。在对共党高官的公开审判中,指控通常是外国刺探情报。因此外国人或任何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人都成了嫌疑犯。再没有俄国人参加美国的棒球比赛了。很快,连棒球运动都没有了。

通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其他的俄国见证者们,我们了解到了午夜逮捕、审问和逼供,以及拖着挤满瘦弱囚犯的车厢开往四散在北极、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及其他各处劳改营的火车。楚利迪阿斯通过大量的书信和文件、以及1930年代中期在美国棒球队打球的两个人——维克托·赫尔曼和托马斯·斯戈维沃——所出版的回忆录来追溯赶上这次疯狂行动的美国人的故事。与在古拉格偶遇的队友们中的许多人不同,这两人从关押中挺了过来:赫尔曼在俄国中部,斯戈维沃在科累马。没人知道在这次清洗中有多少美国移民被抓,继而丧生于监牢或劳改营,不过,1997年在芬兰边境的一个巨大墓穴中发现了140多具美国人的尸体。楚利迪阿斯通没有试图估算死去的美国人的总数。我自己的猜测是数千人;如果加进当时居住在苏联的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中的受害者,总数可能上万。

赫尔曼和斯戈维沃的证言可以在一些关于古拉格的历史著作中找到。但楚利阿迪斯最出人意料的贡献是记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被关押的美国人的绝望的求援——一些从监狱里偷带出来,一些由仍然自由的家庭成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守卫森严的美国大使馆作出——是如何被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和在华盛顿的官员们所置之不理的。楚利阿迪斯深入调查许多国务院的旧通信文件,并取得了证据,甚至发现一个从劳改营偷带出来的木牌,上面用英语写着:“救救我吧,以及其他的人”。即便是保守的小小奥地利的大使还能通过让二十多个奥地利左翼人士躲在自己的地下室而救了他们的命,美国官员却因为瞧不起那些出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而来到俄国的国民,几乎什么也没做。而如果付出努力,他们本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因为精明的斯大林十分想讨好一个有价值的外贸合作伙伴。外交官们一次又一次将求助搁置,主要理由是没有证据表明涉嫌的囚犯是美国公民。这个理由的确通常是正确的,因为美国人到达苏联工作后,俄国人通常没收他们护照——以便更好地进行控制,同时也为了藏匿一些美国护照,而后对其篡改,用于将苏联间谍送到国外。

了他们的孩子,很快苏联至少五个城市有了用英语教学的中学。斯大林用四千万美元从亨利·福特那里买了75000辆A型轿车,外加一个完整的福特工厂——当然,它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来操作,因此更多美国人过来了。

这些新来的人也带来了棒球运动。楚利迪阿斯在书中收入了一组1934年夏天在高尔基公园微笑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球员的照片,他们的运动衫上印有识别其球队的首字母:莫斯科外国工人俱乐部和高尔基汽车工人俱乐部。在成为共产主义者

为何这些官员如此冷酷无情？原因之一，制造太多的麻烦可能会把成长中的年轻外事官员从待遇很好的职位上赶下去。此外，外交官中很少有生性喜欢惹事的；像驻土耳其的美国公使拉乌尔·沃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或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那样，努力引起公众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注意的人绝对是少数。最后，1930年代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那些谨慎行事的人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他们的老板。



这是 1930 年代移民到前苏联的美国人的一张合影

在美国，在向总统好友和竞选功臣安排大使职位的实践中，从没有如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6 年选择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E. Davies）作为驻莫斯科美国大使更不幸的做法了。戴维斯对俄国一无所知，之前他是个律师，在帮助 1920 年代繁荣时期的公司避税而挣了笔小钱。后来娶了家产丰厚的谷物大亨的女继承人玛乔丽·麦利威瑟·波斯特（Marjorie Merriweather Post），她以拥有大量豪宅而著称，其中之一便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游艇——三桅杆的海云（Sea Cloud）号，共有 62 个船员。

戴维斯“喜欢大的东西”，在批评他在履行抑制垄断的政府公职时的失败时，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说到。那么，斯大林俄国式的“大”则完全地满足了戴维斯。他参加了大清洗中的几次公开审讯，并向国务院报告说正义得到了履行，这令其他外交官震惊不已。看来苏联熟人的突然不见时并未使他感到不安。一位俄国外交联络官曾带戴维斯的女儿和几个朋友出去吃饭跳舞，此时两个男人来到他们桌前，拍了拍这位联络官的肩膀。“他就此消失，再也见不到了”，楚利迪阿斯写道。就是戴维斯夫人也没怎么受到此类事件的干扰。多年后她说，从她的美国大使居所的卧室里，有时能听到妇女和儿童的尖叫声，因为毗邻的大楼有人在午夜被逮捕了。戴维斯夫人的主要兴趣是收藏那些曾属于俄国贵族的艺术品、珠宝和瓷器，当政府通过廉价出售没收充公的收藏品来提高硬通货时，她便毫无节制地买入。

1937 年是清洗抓捕的顶点，这一年戴维斯设法在俄国之外度过了大部分日子，包括乘海云号漫游波罗的海。他在船上宴请宾客的场面令苏联秘密警察都大吃一惊。在莫斯科任上的末期，他对于斯大林给予其两小时的接见而万分高兴；这个独裁者之前已拒掉所有前来会晤的西方国家大使。“他真是个好，正派而伟大的人！”，戴维斯在大使馆对一个下属说。在所有帮助斯大林逃过大屠杀的惩罚的外国否认者和教唆犯中，这对坚定的资本主义夫妇当然是最不可思议的。

楚利阿迪斯书中往后还有一章，讲第二波和第三波进入苏联劳改营的美国人。第二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苏联红军占领德国战俘营时，据其所引用的一个俄国文件，这一波至少有其中的 2800 人。第三波规模较小，是中国人向苏联移交在朝鲜被捕的战俘时。俄国拒绝归还这些人，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随着冷战的进行，曾用于苏联的手段不再有效，更多美国人于是在雪与冰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很明显，楚利阿迪斯不懂俄语，但是除去一些古怪的音译和副标题中的失误（由首字母缩写而成的 gulag 涉及一整个系统，而非单个的劳改营），他的研究并未因此受限。1930 年代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苏联官员至今现在去世，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大清洗的牺牲品；一度于九十年代早期对外开放的俄国档案现在也大多对外国研究者封闭了。这不仅是美国人

的故事，也是苏联人的故事，被楚利阿迪斯利用各类很少被使用的，绝大部分属于美国国内资料，熟练地讲述出来。他以此铭刻了一场历史大灾难的一小部分，并提醒我们，斯大林政权是如何不仅吞没了人的生命，也吞没希望、梦想和信任的。那些来到俄国的美国棒球运动员发现自己陷在了一个可悲的游戏中——不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美国大使馆，都没有他们的裁判。这本书令我想起当年在俄国看到的巨大墓穴——一处在西伯利亚中部，里面全是遍布尘土和弹孔的头盖骨，另一处是在科累马一个多雾和大风的小山腰上，里面满是通过电力漂白的骨头——这其中会不会有曾是接手、投手或一垒手的我的同胞的尸骨呢？

本文作者亚当·霍克希尔德 (Adam Hochschild) 的著作包括:《午夜的光子: 一次南非之旅》(2007) 和《埋葬锁链: 大英帝国反奴运动史》(2006)

本文原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 杂志 2008 年 12 月 23 日号。原文标题为 Americans in the gulag: The little-known story of US citizens trying to escape the Depression.

Tim Tzouliadis, THE FORSAKEN,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e Gulags, Hope and betrayal in Stalin's Russia, 472pp. Little, Brown.

西方强大的秘密：宽恕与讽刺

罗杰·斯克鲁顿 (Roger Scruton)

翻译：吴万伟 (武汉, wuwanweione@yahoo.com.cn)

无论在哪里，只要西方的政治秩序有了立脚之地，我们就能发现言论自由：不仅有公开表达不同于他人的信仰和道德观点的自由而且有讽刺庄重嘲笑荒谬的自由，包括上帝的庄重和荒谬在内。这种心灵上的自由要求世俗政府，但世俗政府怎样才能拥有合法性呢？

这个问题是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法律是通过得到必须尊重这些的人的认可而获得合法性。人们表达这种认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真正的或者隐含的“社会契约”，每个人都相互同意政府管理原则，另一种是人人都参与制订和实施法律的政治过程。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是我们所说的“公民身份”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政治社会和宗教社会的区别：政治社会由公民组成，宗教社会由“听任摆布”的臣民组成。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当今对西方的简单定义，公民概念是个很好的起点。这是千百万移民满世界寻找的理想：用同意权交换能为他带来安全和自由的秩序。

这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但它不能保证让人获得幸福。纯粹建立在认同以及与邻居礼貌地交往的基础上的生活总缺少一些东西，那些穆斯林通过古兰经的话语而保留的力量强大的东西。这种缺失的东西有很多名字，比如意识、意义、目的、信仰、兄弟情、服从等等。人们需要自由，但也需要宁愿放弃自由而得到的其他目标。这是“伊斯兰”这个词包含的思想：即不求回报、心甘情愿的服从。

当然，这个词的隐含意义对于说阿拉伯语、土耳其语、马来语或孟加拉语的人来说，含义是不同的。生活在来源于后拿破仑欧洲法制体系的世俗法律下的土耳其人很少愿意承认，他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生活在仍然控制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神圣法律统治下。但是说阿拉伯语的 20% 的穆斯林觉得遵循古兰经的节奏是不容置疑的强制性规定，他们倾向于从字面上理解“伊斯兰”。对他们来说，服从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不仅放弃自由而且放弃公民身份的想法。它可能涉及到人们从世俗秩序所依赖的公开对话中退出，进入“古兰经的庇护”所，正如赛义德·库特布 (Sayyid Qutb) 在一本让人担忧的激发成立穆斯林兄弟社的书中的。公民身份恰恰不是兄弟情的形式，不是出于真心服从而采取的共同行动，而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个体的集合，满足感和意义只局限在私人领域。创造这种可以更新的孤独的形式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我对它的描述产生了一个问题：公民身份是否值得捍卫？如果值得，如何捍卫？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它值得捍卫，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当今与伊斯兰的冲突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如下的真理：仅有公民身份是不够的，要想持久就必须赋予它新的意义，新一代人可以把自己的希望和对身份的探索附着在上面。毫无疑问，当基督教为世俗秩序和意义探索提供仁慈的支持时，两者是非常和谐地共存的。但是如今（尤其是欧洲）基督教已经

从公共生活中退出，而且正退出私人生活。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曾经有段时间我们似乎可以从文化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西方文明的艺术、音乐、文学、哲学传统在改变世界方面留下这么多痕迹，我们觉得把这些东西传递下去已经足够了。每一代人都可以从这些传统中继承他们所需要的精神资源。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第一，热力学第二法则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新能量进入，所有秩序都会衰弱。第二，我所说的“排斥一切的文化”的兴起。本来应该提供新能量的东西在执行任务时已经被文化行李压得踉踉跄跄，越来越力不从心，最终只能把它们扔掉。

这种排斥一切的文化通过媒体、学校传播到西方文明的每个精神领地，让人们普遍产生一种空虚感和失败感，产生一种除了相信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信任或者赞同的自由外什么都没有的意识。但这种自由信仰既不是自由也不是信仰，它鼓励人们在该做出决定时犹豫不决，在该做出选择时缩头缩脑。难怪我们城市里的这么多穆斯林认为他们周围的文明注定要衰亡了，即使这个文明给予他们自由、宽容、世俗的法治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无法得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在具有确定性的社会中长大，如今却到处遭遇怀疑和不确定性。

如果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东西只是拒绝自己的历史和身份，那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必将被那些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希望和安慰以实现他们心底的渴望，即社会成员身份的人类需要的其他未来文明所取代。正如我已经描述的，公民身份并不能满足这个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穆斯林排斥它，反而从“精诚兄弟社”(ikhwan)那里寻求精神安慰。这常常是伊斯兰竞争者的目标。但是如果现代世界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公民身份是我们无法放弃的成就：我们的繁荣、我们的和平与稳定就建立在它上面，它是我们的定义，即使它不能提供幸福。放弃公民身份，我们就无法存在了。

现在需要的不是拒绝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公民身份而是为它提供一个心灵。我们在寻找心灵的时候，应该摆脱具有道歉意味的多元文化主义，重新回到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馈赠，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给西方的自信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第一个礼物是宽恕。怀着一颗宽恕的心生活，我们不仅坚持了公民身份的核心价值而且找到所需要的社会成员身份的道路。幸福不是来自对快乐的追求，也不能靠自由来保证。它来自牺牲：这是西方文化所有值得纪念的著作所传播的最重大信息。这种信息在排斥一切的噪音中消失了，但是如果投入精力重新复兴它的话，能够再次听见它的召唤。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牺牲的第一个行为就是宽恕。宽恕别人的人献出了怨恨，因此放弃了曾经对他来说非常宝贵的东西。

古兰经在任何时候都激发出神的仁慈、同情、和正义，但是古兰经的真主不是宽厚的神。在古兰经文献中，真主很少宽恕，即使宽恕时也非常地不情愿。他显然对人类的愚蠢和软弱感到恼火，实际上他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事。和希伯来圣经或者《新约全书》不同，古兰经里根本没有笑话。

这让我们再看西方文明的另外一个礼物：讽刺。在希伯来圣经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烈的讽刺味道，《塔木德经》中有明显的表现。但是耶稣基督的判断和寓言中的新型讽刺是最重要的，这种讽刺揭露了人类的愚蠢，并用挖苦的口吻向我们展示如何忍受这种愚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耶稣对于被控犯了通奸罪的妇女的审判：“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译者注：请参阅约翰福音第8节）。换句话说“忘了它吧，难道你没有想过她做的事吗？至少在心中已经做过了？”有人曾认为这个故事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即早期基督徒在救世主死后收集的表现其智慧的许多故事之一。但即使这是真实的，仍然证明了基督教把讽刺作为传播福音的核心的观点。指出讽刺是把苏格拉底和耶稣结合起来的美德的人是后启蒙时代的麻烦不断的基督徒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过世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讽刺是与后现代世界观密切相关的思想状态，一种从旨在达成共识的判断的退却，或一种不做判断的新共识。但是讽刺的性格最好被理解为美德，一种追求切实可行的成就和道德成功的习性。为了给这种美德下定义，我要把它描述为承认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事物的他异性的习惯。不管你多么坚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或自己观点的真理性，都能把它们看作别人的行为或观点，并因此对其重新描述。这样定义后，讽刺和嘲讽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它是接受而不是拒绝。这定义也指出了两种方法：通过讽刺，我学会接受被凝视的他人也接受正在凝视他人的自己。按照罗蒂的说法，讽刺不是不做出判断，而是简单地承认进行判断的人也被他人判断，被自己判断。

我认为西方的民主遗产来自宽恕他人的习惯。宽恕他人就是在心中给予他人未来的自由。因此承认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主权，可以自由地做正确和错误的事情。因此，为宽恕提供永久空间的社会将自动走向民主，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影响他的决定在做出的时候都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承认和接受他人的讽刺放大了这种民主倾向，也帮助消融民主文化中的平庸和趋同性等负面因素。

宽恕和讽刺位于西方文明的核心。它们是我们必须最自豪的东西，是让敌人缴械的最主要手段，构成了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公民权概念的基础。宽恕和讽刺在我们的法律概念中的表现是通过发现冲突的公正处理方法而解决冲突的手段。人

们常常没有认识到这种法律概念和穆斯林的教法（沙里亚）（sharia）之间的根本区别。沙里亚被认为是真主发出的法令体系，是不能够也不需要被进一步证明的。

上帝的命令对于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徒也是重要的，但是人们认为依靠它们来对人类社会进行良好的管理是不够的。必须引进另外一种法律来补充，这种法律可根据不同形式的人类冲突采取不同的反应。捐献钱财的寓言说得很清楚：（让恺撒的事归恺撒，让上帝的事归上帝）正如两把剑的教皇原则，好政府也依赖两种法律，人类的法律和上帝的法律。我们的法院执行的法律要求当事人只“屈服”于世俗的裁决，它把任何一方都当作自由采取行动的负责的个人。法律的这个特征特别清楚地体现在说英语国家的人心中，他们的不成文法体制包括了法院必须坚持的自由（公民从国家那里争取到的）。沙里亚包括了法院必须坚持真主提出的义务。正如在古兰经和《圣行》（the Sunna）中显示的，它是确保“服从”真主意志的手段。

这些思想对我们现在的情形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我们求助于犹太教基督教遗产的这些深层内容怎么帮助我们应对伊斯兰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怎么帮助我们既获得迫切需要的与伊斯兰的和解又保证我们的政治遗产安全无虞呢？

在大众的心里，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回应，好心的评论家宽慰我们说恐怖主义中没有新东西，容易导致支持者走向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教也没有新东西。难道不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了么？恐怖主义难道不是在 19 世纪的俄罗斯民粹派找到的政治武器，后来又被 20 世纪的激进运动采用的吗？

这种反应是有道理的，它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更深刻的动机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驱使人们使用恐怖手段？它是否如辩护者暗示的那样是被作为战术措施使用的还是当作目的本身呢？从某种意义上看，把现代恐怖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启蒙运动、人类平等的观念、尼采在现代社会中辨别出来的无名怨愤（ressentiment）态度等是有道理的，这种怨愤就是一种迫切想摧毁别人手里拥有的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的欲望。但是这种诊断忽略了一个事实，就像以俄罗斯民粹派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名字的来源）那样的明显与任何目标都没有关系的动机。不错，有时候恐怖分子如布尔什维克或爱尔兰共和军（IRA）、或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会为自己贴上事业的标签，让人们相信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功、统一的爱尔兰、或巴斯克民族国家的实现，在达到目的后，他们就会放下武器。但是这些运动背后的目标往往是模糊的和乌托邦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空想。而无法达到的目标似乎是他们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为他们不断出现的暴力进行辩护的方式。

恐怖分子要么完全没有目标，要么投身于非常模糊的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事业，没有人（至少他们自己）相信这种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描述的那种俄罗斯民粹派。我年轻时候的意大利红色旅（Brigate Rosse）和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也是如此。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在他的权威著作《鲜血和愤怒》中说现代恐怖主义感兴趣的是暴力而不是靠暴力达到的任何目标。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秘密特工》中描述的对任何破坏都兴高采烈的教授就是这样的典型。

因此，恐怖主义事业的模糊性和乌托邦特征是它的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意味着事业无法定义或者限制行动，它在等待寻求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世界的恐怖分子往里面填充意义。你要杀害既没有得罪你又无正当理由受到惩罚的人，就必须相信自己是代表正义的天使，接着要开始把杀戮看作展现你是真正的天使的方法。你的存在得到了最终的本体论证明。

恐怖分子追求道德上的狂喜，这是一种超越普通人判断能力之外的意识，是只有上帝才享受的那种自信的许可。换句话说，这种恐怖主义是在寻找意义，一种抽象术语下的公民身份所无法提供的意义。即使最世俗的恐怖主义也有一种宗教上的饥渴。

把无辜的准备去购物的斯密斯太太和她的孩子杀死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这种塑造自我的策略不能简单地从杀戮的欲望，斯密斯太太必须成为别的内容，一种抽象条件的象征和全球敌人的化身。因此，现代的恐怖分子依靠一种学说来除掉目标对象的人性。马克思的理论能非常好地服务于这个目的，因为它创造了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敌人”的概念。在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里它的功能等同于纳粹意识形态中犹太人的功能。斯密斯太太和孩子站在抽象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目标后面。当炸弹击中这个虚构出来的目标后，弹片碰巧很容易地进入了斯密斯太太的身体。让斯密斯一家感到悲哀的是，你常常听到恐怖分子抽象的道歉，他们说斯密斯太太被炸飞不是他们的错，人们不应该以那样的方式站在目标后面。

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恐怖分子也同样受到寻找意义的艰难过程所驱使，同样需要站在受害者之上摆出形而上学原则为自己洗刷罪名。自由、平等或者历史权利等概念对他们的思维没有影响，他们对袭击的目标所享受的权力和特权不感兴趣。现实世界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真正价值，如果说他们有时候瞄准权力，那是因为权力能帮助他们建立神的国家。他

们像其他人一样知道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能在屡屡失败后不断重新开始。他们对于他人的性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性命同样不当回事。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没有特殊的价值，死亡经常在视野的地平线尽头召唤他们。只有在死亡中，他们才看到真正重要的唯一意义。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最终超越这个世界以及世界要求我们履行的对其他人的义务。

受到排斥一切的文化所熏陶的人不大愿意承认寻找意义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他们倾向于认为所有冲突都是政治性的，关心的都是谁对谁享有控制权。他们倾向于相信造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原因是恐怖分子所抗议的“社会不公”，因为所有其他寻求纠正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得恐怖分子这些让人遗憾的方法变得不可避免。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完全错误地解释了笼统的恐怖主义和具体的伊斯兰主义的动机。像欧洲民粹派一样，伊斯兰恐怖分子首先感兴趣的是自己的精神状况，他们才不在乎真的去改变尘世里的小事。他们想进入神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这意味着他们要摧毁包括自己的身体在内的挡在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来见证神的法律，进入神的王国。死亡是服从的最后行动，通过死亡，他融化成为新的不朽的兄弟情。他的死亡所造成的恐怖不仅提升兄弟情的世界而且给予下面激烈竞争的陌生人世界带来破坏性打击（这个世界的组合原则是公民身份而不是兄弟情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认识到面临的新威胁，它没有局限性也没有可以协商的目标，我们无法轻易地采用军事手段，其他常用手段也根本不起作用。我们不能给伊斯兰分子提供任何让他们能够说达到了自己目标的东西。如果他们成功地用核导弹摧毁了一座西方的城市或者用致命病毒消灭了某个区域的人，他们将认为这是个巨大胜利，虽然它不会带来任何物质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别的什么利益。

当然，普通穆斯林民众会对这样的暴行惊骇不已，会认为像基地组织实施的那种滥杀无辜是真主的法律绝对不允许的罪恶。有些让人鼓舞的迹象显示善于思考的穆斯林在企图找到办法公开承诺与其他两个亚伯拉罕诸教派别和睦共处，要坚持爱邻的原则，即使邻居的信仰与自己不同。2007年还有140名杰出穆斯林学者签名的对西方宗教领袖的公开信，呼吁不同信仰者的对话，以相互尊重作为共存的基础。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伊斯兰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宗教权威的任何决定性资源。每个宗教领袖都是自封的，像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在自己的追随者圈子之外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人们常常说伊斯兰没有自己的新教改革是多么大的遗憾啊。实际上，它是个没有终结的新教改革系列，每个派别都宣称自己是服从真主问题上的唯一真理。

第二，（我认为与第一条有联系）穆斯林在无视他们以信仰的名义下犯下的种种罪行方面表现惊人，而且攻击任何贬低它的人。臭名昭著的丹麦漫画引起穆斯林的愤怒，把各个地方的穆斯林团结起来采取破坏行动并呼吁报复。几天后，什叶派穆斯林最圣洁的地方之一萨马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被伊斯兰分子炸掉了。但伊拉克之外的抗议者在哪里呢？伊斯兰恐怖分子杀死的穆斯林比非穆斯林多得多。但是那些宣称穆斯林讲话的人什么时候提到这些统计数字了呢？因此，糟糕的漫画的整个问题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先知名义下犯下的罪行。他赞同不赞同这样做呢？

穆斯林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常常阻碍他们把针对信仰的敌人的义愤转向穆斯林同胞。这种双重标准正是缺乏讽刺能力的直接后果。它们来源于不能接受任何事情的他异性，即站在自己的观点甚至自己的信仰之外把它们当作别人的信仰来看。我不是说在这个方面伊斯兰总缺乏讽刺能力，苏非（Sufi）大师的著作中就充满了讽刺，但苏非大师（我特别想到诗人鲁米（Rumi）和哈菲兹（Hafiz））属于那个被伊斯兰分子抛弃的伟大的认识自己的伊斯兰文化，相反拥抱了阿布德阿·瓦哈卜·布哈里（Ibn Abd-al-Wahhab）的狭隘种族偏见或者穆斯林兄弟社和赛义德·库特布自我欺骗的怀旧情结。

因此，西方与穆斯林的对抗不是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它不是走向协商或者要求解释的第一步，而是生存的对抗。人家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什么权利存在？”作为回答，我们可能说“什么权利也没有”，同时期待对方接着说“我想也是。”一个回答只有直面问题才能转移威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彻底说服他们，我们确实存在的权利，我们也愿意承认对方同样有存在的权利，妥协必须是相互的，其他任何策略都没有成功的机会。

基地组织可能很弱小，摧毁西方的整个阴谋在新保守主义者的头脑里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幻想而已，这些保守派在自由派的头脑里同样是异想天开的人。但是威胁确实并非来自阴谋或者某个组织，而是来自我们不完全明白的经受伤痛经历的个人，那些没有宽恕和讽刺两个天赋的穆斯林移民遭遇现代世界的经历。这样的人是无法预测和无法理解的环境下出现的无法预测的副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他的动机的了解表明没有任何政策能震慑恐怖袭击。

那么，在生存对抗中我们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强调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宽容美德和成就，表现出

批评和纠正所有罪恶的意愿，我们知道需要改善的空间很大。我们应该复兴洛克对自由和许可的区分。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彻底明白自由是一种秩序，不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自我放任的许可。我们应该停止嘲笑父母或者祖父母看重的东西，应该自豪于他们取得的成就。这不是傲慢而是对于我们基本权利的公正认可。

我们也应该放弃造成西方公共生活困惑的所有多元文化主义的模棱两可，重新确认西方传统中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即公民权的观点。我们要发出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信号，我们愿意与人分享，但不愿意让它遭到破坏。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唯一可以化解当今冲突的事。因为宽恕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发出这个信号已经足够了，即使我们用讽刺的精神表达出来。

译自：**Forgiveness and Irony Roger Scruton.**

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作家和哲学家。本文选自他在加拿大卡尔加里（**Calgary**）大学西方文明推进麦克尼什讲座（**McNish Lecture**）上的演讲。

http://www.city-journal.org/2009/19_1_the-west.html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